

家戶組成、社會福利支出年齡傾向與福利國家型態對青年貧窮的影響：東亞與西方福利國家的比較

戴翠莪、陳易甫

007

家戶組成、社會福利支出年齡傾向與福利國家型態對青年貧窮的影響

本論文接受科技部計畫(MOST 107 - 2410 - H - 305 - 032 - MY2)的經費補助，特此感謝。作者並感謝本期刊匿名審查人、以及中正大學呂建德教授給予之寶貴意見。

※收稿日期：2019.11.12 接受刊登：2020.06.08

戴翠莪(✉)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地址：237303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社科大學六樓

Email：tsuiotai@mail.ntpu.edu.tw

陳易甫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青年貧窮文獻顯示一項矛盾趨勢：社會福利支出越高、福利政策越完整的國家，其青年貧窮率越高；而東亞國家的福利支出雖然較低，其青年貧窮風險卻低於西方工業化國家。上述的矛盾趨勢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探討。本文使用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 25國家戶收支調查資料，檢視影響青年貧窮矛盾趨勢的微觀與鉅觀因素。我們的實證結果顯示，家戶組成差異是造成高社會福利支出國家有高青年貧窮率的關鍵機制，一旦控制了家戶特質，東亞青年失去其經濟優勢，反而比北歐青年更可能陷入貧窮。這項發現呼應了儒家式福利體制的一項重要特色，亦即，家庭承擔了個人經濟福祉的責任。在此同時，雖然家戶組成強烈形塑高福利支出與高青年貧窮的趨勢，整體社會福利支出越高、社會支出越年齡中立，越能減低青年陷入貧窮的可能性。總結來說，本文有兩項重要貢獻。首先，本文從多層次的角度來探究青年貧窮趨勢，是極少數檢視社會支出的年齡傾向對青年貧窮影響的論文；其次，既有青年貧窮跨國研究幾乎只專注西方國家，我們將臺灣、日本、南韓加入分析，比較東亞與其他工業化國家青年的經濟福祉，本文指出臺灣是25個工業國家中社會支出最偏向高齡群體的國家，彌補了跨國文獻專注西方社會的不足。文末也對相關政策提出討論。

關鍵詞：貧窮、青年、社會福利支出、年齡傾向、社會福利國家型態

Effects of Household Composition, Social Welfare Age Orientation and Welfare Regimes on Youth Poverty: Comparison of East Asian and Western Welfare States

Tsui-O Ta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Yi-Fu Ch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he paradox of countries with high social expenditures having high youth poverty levels is well documented. 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relatively low social spending budgets, but their young adults are at lower poverty risk compared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Using data from 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for 25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e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macro- and micro-level factors on young adult poverty risk. Household composition was identified as a key factor connecting high social expenditures and high youth poverty levels. When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re held constant, East Asian young adults are more likely to fall below the poverty line compared to young adults in Nordic countries, indicating household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Confucian welfare state safety net. Overall social expenditures and lower pro-elderly social spending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young adult poverty risk. Among the 25 countries, the Taiwanese welfare system is the most skewed in favor of older adults.

Keywords: poverty, young adults, age orientation, social expenditures, welfare regimes

一、研究問題

青年經濟安全每況愈下。事實上，年齡層的收入差距在過去一百年來發生很大的變化。大約一世紀前的英國，所有年齡層中，孩童與年長者是最為貧窮的一群（Rowntree 1901）；時至今日，在英國、瑞典、丹麥等許多西方工業國家裡，青年卻成為最貧困的年齡層（Iacovou 2009; Tai 2017; LIS 2019）。這樣的轉變可能源於當代產業與就業結構的變化，導致不同生命階段機會結構的改變。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不禁要問：當年輕人邁入成年的關口、身處日益加劇的經濟劣勢時，他們是否能夠像他們的父母一樣獲取足夠的經濟安全？

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有貧窮問題，但每個國家的貧窮問題程度不同。從社會福利制度觀點來看，根據許多跨國實證文獻結果，社會福利支出與貧窮率（如整體貧窮率、老年、兒童貧窮率）大抵呈現負向相關的趨勢，亦即，整體社會支出越多、社會福利制度越完善的國家，貧窮率就越低（Kenworthy 1999; Bradbury and Jäntti 2001; Caminada and Goudswaard 2009; Caminada et al. 2011; Celikay and Gumus 2017）。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者的負向相關趨勢卻不適用解釋青年貧窮現象。不同於前面的討論，文獻觀察到一項矛盾趨勢：社會福利支出越高、整體福利政策越完整的國家，其青年貧窮率越高。舉例來說，丹麥、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一向被視為福利制度相當完善的社會，他們的整體貧窮率與兒童貧窮率非常低，然而他們的青年貧窮率卻非常高（Aassve et al. 2013; LIS 2019）；相反地，南韓、臺灣、日本等東亞國家的福利支出比較低，但是其青年貧窮率卻也相對低（Tai 2017）。

有關青年貧窮矛盾趨勢的現象可以從多個面向來討論。

Esping-Andersen (1990, 1999) 曾提出，影響個人經濟福祉的主要結構性因素是家戶組成、市場收入、以及社會福利。首先，家戶組成與青年貧窮息息相關。西方研究指出，離家是青年陷入貧窮的關鍵因素 (Iacovou 2009; Mendola et al. 2009; Ayllón 2015)。舉例來說，北歐社會規範強調獨立自主，即使尚未經濟獨立，當地青年甚早離家、自組獨立家戶，一旦離家的北歐青年，其收入常常低於貧窮線。Tai (2017) 的研究也發現，成人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普遍性是臺灣、南韓等東亞青年遠離貧窮的重要因素。其次，支持個人經濟福祉的另一項重要資源是市場收入，包含個人或家庭的工作薪資，但是，比起其他年齡層的成年人，青年更常從事部分工時、臨時性工作、甚或面臨失業，青年的工作收入通常較低 (Quintini et al. 2007)，也因此有更大的機率陷入貧窮處境。

另一方面，從高社會福利支出與高青年貧窮的正向關連來看，意味著社會福利的支出可能具有年齡傾向 (age orientation)、年齡偏頗 (age bias) 情形。亦即，政府可能給予某些年齡層更為完善的保障。過往的實證研究發現，很多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對高齡人口提供更多經濟與服務資源 (Lynch 2006; Vanhuyse 2013; Gál et al. 2018)，這樣的情況也就引起國家資源分配的年齡階層化或世代不公平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的爭議與討論 (Preston 1984; Kvist 2015)。

承接上述討論，當代青年經濟福祉下降、以及高青年貧窮率與高社會支出這種矛盾的現象出現，亟需學界對於青年貧窮成因進行系統性的探究。在過往文獻的討論中，導致貧窮現象的機制是多面向且多層級的 (Kenworthy 1999; Tai and Treas 2009)。然而綜觀既有的青年貧窮的實證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或者著重個人與家庭微觀因素 (例如：Iacovou 2009; Ayllón 2015)、或者專注於鉅觀因素與國家層級分析 (例如：Choudhry et al. 2012; Aassve

et al. 2013)，很少文獻同時檢視造成青年貧窮的鉅觀與微觀因素。尤為重要的是，雖然學界關心國家資源分配的世代或年齡不平等議題，卻鮮少經驗研究去檢視社會福利的年齡傾向對青年經濟福祉的影響。是故，本研究將同時考慮鉅觀與微觀因素的作用，用以釐清青年貧窮的成因。

此外，過往有關青年貧窮的文獻中，絕大部分都以西方福利國家為主，很少有研究比較東亞與其他國家的趨勢與成因 (Tai 2017)。將臺灣與其他東亞國家納入國際研究，有其學術與政策討論的重要性。首先，臺灣等東亞社會的青年貧窮趨勢與許多西方國家呈現很大的差異，西方文獻未必能解釋臺灣現象。其次，關於社會福利資源的配置、經濟與就業環境、家戶組成這些社會結構的發展，東亞社會也與西方國家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臺灣、韓國等東亞國家（日本除外）的社會福利支出遠低於大部分西方國家，福利政策制定的歷史脈絡與內容也頗為迥異 (Holiday and Wilding 2003；李易駿、古允文 2003；葉崇揚、古允文 2017)；就家戶組成而言，東亞社會的普遍多代同住安排、代間頻繁互動與支持 (Marcum and Treas 2013；林如萍 2012)，更是有別於西方社會；以經濟發展和就業環境來說，雖然東亞經濟持續成長，但由於產業結構的轉變，青年失業率節節上升，東亞青年失業率是其母國整體失業率的三倍，高於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兩倍，顯示東亞青年的就業情況日益惡化 (OECD 2016；李健鴻 2015)。總而言之，東亞社會的青年貧窮趨勢與結構性因素的發展都和西方社會呈現很大的差異，若將臺灣等東亞社會納入跨國比較，不但能擴大青年貧窮研究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藉由跨國研究比較，我們能更瞭解臺灣青年的處境。

針對既有文獻缺口，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國家與個人層面來檢視影響青年貧窮的原因。具體的研究問題是：一、哪些鉅觀與微觀的因素造成高社會福利支出國家卻有高青年貧窮率這樣的

矛盾現象？二、社會福利支出的年齡傾向如何影響青年貧窮的可能性？三、哪些因素影響東亞青年與西方青年的貧窮差異？

為了探究上述研究問題，本文使用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25 國資料，本研究的實證結果有助於我們瞭解社會福利制度、家戶組成、經濟發展如何形塑跨國青年貧窮的差異，所得的研究結果將對福利政策提供非常重要的實證參考。尤其，本研究擴大既有跨國文獻聚焦西方青年貧窮的限制，加入臺灣、日本、南韓三個東亞國家，藉由跨國研究比較，我們也能更瞭解影響東亞青年經濟福祉的因素。

二、文獻探討

(一) 定義青年

青年的界定不一，學者 Arnett (2000) 在青少年時期與成人時期之間特別劃分出一段稱為成年初顯期 (emerging adulthood) 的時期。依據 Arnett 的說法，這個時期橫跨 20 多歲，是個人從依賴家人狀態過渡到獨立生活的一段時期。在這段時期，青年面臨社會角色改變、經歷多種生命階段變換，如離家、完成學業、進入職場、結婚、生子等。然而，也因為這些人在身體、心理或生活上可能尚未完全準備好面對獨立生活與社會期待，而產生負面的後果。例如，離家與畢業意味著個人開始擔負生活費用，這也影響了青年的經濟福祉，成為晚近學術與政策研究重要的議題。雖然，Arnett 等人 (2014) 認為成年初顯期有可能因為高等教育擴張、青年延後進入職場、延後婚育等趨勢，而延伸到 29 歲、甚至三十幾歲。不過，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LIS 等國際機構通常將青年定義為 15-24 歲或 18-24 歲的人口，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與 OECD 的青年失業率計算通常只包含 24 歲以下的青年（ILO 2019; OECD 2018）。為了儘可能符合國際指數計算，本研究將青年定義為 18-24 歲的個人。

（二）青年貧窮的國際趨勢

各國的青年貧窮風險高低有異。根據一項 22 國研究（Tai 2017），在 2010 年左右，就 18-29 歲年齡層的貧窮率而言，臺灣的比例最低，約為 5.16%，挪威的貧窮率最高，達到 23%。若比較福利國家型態（welfare regimes）間的青年經濟安全趨勢，東亞國家（臺灣、日本、南韓）與後共產國家（捷克、波蘭）的貧窮率最低，北歐社會民主國家、西班牙、美國、英國、德國等地的青年面對偏高的貧窮機率。經濟衰退對青年的影響甚鉅，由於 2007-2008 年間發生國際金融危機（Global Financial Crisis），青年貧窮的上升幅度在北歐、南歐最為明顯（Aassve et al. 2013）。

各國青年處於貧窮狀態的時間也分長短。在 1990 年代，雖然北歐青年的貧窮率很高，但北歐青年身處貧困的時間短暫；南歐青年的貧窮率雖然低於北歐，但是南歐青年落在貧窮線以下的時間較長（Iacovou 2009; Ayllón 2015）。

各年齡層面臨的貧窮風險在不同國家也有差異。以相對貧窮率來說，在北歐，雖然青年貧窮率很高，老年與兒童貧窮比例卻很低；南韓與臺灣卻呈現相反態勢，青年貧窮比例遠遠不及老年貧窮比例。以 2012-2014 年為例，臺灣與南韓的老年貧窮率分別為 26% 和 47%，芬蘭與丹麥的老年貧窮率分別為 7% 和 4%。美國各年齡則都有較高的貧窮風險，美國老年與兒童貧窮率達到

20% 與 19% (LIS 2019)。這些國際差異意味著不同年齡層在各個社會面臨不同的機會結構，依據上述討論，這些差異可能由社會福利制度與其年齡傾向、各國經濟環境和家戶組成三大因素造成。以下分別就這三方面進行文獻的探討。

(三) 社會福利支出的年齡傾向

隨著福利國家的擴張，社會福利政策成為影響個人經濟福祉極為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根據制度論與生命歷程觀點 (institutional and life course perspectives)，在福利國家，個人的生命歷程是由國家制度所建構而成 (Mayer and Schoepflin 1989)。由於社會規範、生物理論、及行政作業便利等因素，各項福利政策經常用年齡來劃分施行對象、界定福利權利與公民義務。但是公共資源是有限資源，各年齡層、各世代、各族群通常被視為爭取公共資源的競合關係，若某年齡層得到較多資源，其他年齡可能因而獲取較少資源，所以有些學者將年齡階層化與福利制度的年齡傾向相連結，他們認為社會福利資源在各年齡層 (或世代) 的分布不均等，因而造成年齡階層化、世代不正義的現象 (Preston 1984; Lynch 2006; Kvist 2015)。例如，Preston (1984) 指出，在 1970-82 年間，美國老年福利支出大幅增加，非老年的福利經費卻下滑，在此同時，美國兒童貧窮問題逐年攀升；Preston 強調，美國福利政策著重中高齡人口，加劇美國兒童的經濟困境。過去幾十年來的研究也發現，許多國家的老年社會福利支出超過非老年人口的支出 (O'Higgins 1988; Gauthier 1999; Lynch 2006; Gornick 2007; Tepe and Vanhuyse 2010; Vanhuyse 2013; Gál et al. 2018)。

至於驅使福利政策年齡取向的原因，許多文獻提出解釋。不少學者從福利政策發展脈絡與政黨選舉競爭來探究，將這樣的年

齡偏好連結至福利制度的安排 (Hicks and Misra 1993; Huber et al. 1993; Pampel 1994; Lynch 2006)。Pampel (1994) 認為人口組成對社會政策的影響端視社會福利發展的政治環境，根據他針對 18 個民主國家的研究發現，在 1959-1986 年間，在組合主義 (corporatism) 與左派政黨較強勢的國家，老年人口比例與公共支出年齡階層化的連結並不明顯，因為這些國家的階級與工會組織是驅使社會福利政策發展的主要動力，階級組織與職業工會更強調各自階級群體的權利，因而減低各年齡層的利益衝突；相反的，在自由主義型態國家 (liberal)、或低度組合主義國家，人口老化與老年支出則呈現正相關，由於這些國家的階級組織與工會勢力比較薄弱，年齡層的利益衝突因而凸顯。

Lynch (2006) 則指出，社會支出分配與社會福利系統有關。根據 Lynch 的論述，社會福利系統大致分為兩種，分別是依據職業身分、或依據公民身分來定義福利政策的權利義務。前者主要包含的國家是南歐與歐陸國家、日本等，這些政府當初制定的就業與年金政策在於保障典型、核心勞動人口 (typical or core workers)，而受到優渥保障的核心勞動人口已陸續邁入中老年，因此老年福利支出節節上升。採用第二種系統的主要國家是北歐社會民主 (Nordic social democratic) 國家，北歐福利制度具普遍性 (universalism)，同時保障核心與邊陲勞動人口。至於青年的就業保障，由於他們剛進入職場，因工作經驗不足等因素較可能從事部分工時 (part-time) 或其他非典型工作 (non-standard work)，在同時保障核心與非核心勞動人口的北歐，青年具有一定的福利支持，但在以職業身分、社會保險為依據來發展的福利國家，青年則不一定能得到完整保障。

接續上述福利制度發展脈絡的討論，Chauvel 與 Schröder (2014) 的研究則強調，福利國家型態發展對世代的影響力高於對年齡層的作用，根據他們的分析，對比於年長與年輕世代

(1935、1975 年左右出生)，中西歐與南歐的福利措施對現在陸續進入退休潮的世代 (1950 年左右出生) 更有利，因為當時實施優渥就業與退休相關福利保障的時機，正值 1950 出生世代進入職場，後來這些政府逐漸緊縮就業與退休保障。相較於中西歐與南歐，在北歐社會民主、自由主義國家裡，各世代間的社會福利保障差距較小。

再者，有些學者從社會投資 (social investment) 這個國家福利施政理念的角度 (Morel et al. 2012；黃志隆 2013)，將社會風險分為新、舊類別，而新舊風險與政策回應也連結到政策的年齡傾向 (Kvist 2015)。具體來說，針對工業社會所造成的舊式社會風險，如退休、失業、傷病等問題，許多政府制定補償性社會政策、提供所得移轉。隨著社會變遷，後工業社會產生新型風險，包括長期失業、低技能的非典型工作就業、工作貧窮、單親等多元家庭組成的增加。為了回應社會風險變遷，學者與政策制定者強調將社會政策轉變為社會服務式的投資性社會政策，例如將更多公共資源投注於人力資本發展、兒童與青年教育、照顧政策、與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黃志隆 2013；呂建德等 2014)。對應於既存 (舊) 社會風險，如失業補助與退休年金等補償性支出增加，新風險集中於非高齡人口，針對這些新風險的社會支出也被視為偏向非高齡人口的支出。由於國家資源有限，解決新舊風險的政策支出也意味著年齡、世代的競合關係 (Tepe and Vanhuyse 2010)。

雖然大部分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呈現年齡差異，但其年齡傾向的立場卻不一致。Lynch (2006)、Tepe 與 Vanhuyse (2010)、Vanhuyse (2013) 等研究根據各項社會支出來計算社會福利政策的年齡傾向指數 (age orientation index)。大致來說，上述研究將老年與遺屬支出 (old-age and survivors) 視為老年人口社會支出，將家庭政策 (family policy)，例如

有薪育嬰假、公共托育中心、兒童照顧津貼等)、失業給付(unemployment benefits)、積極性就業政策(activation labor market programs, 例如培訓計畫、協助求職、提供就業補貼、創造就業機會等支出)視為非老年人口支出。雖然計算方式不完全一致,但這些研究的發現大致相近,在所有國家中,老年社會支出都高於非老年支出,南歐、美國、日本等國的社會福利最偏向高齡人口,北歐政策則比較年齡中立(age-neutral)。

然而,從社會福利支出來解釋,我們也發現一個矛盾的現象:北歐的社會福利支出最為中立,日本的福利支出傾向高齡人口,但是北歐青年的貧窮率高於日本青年。這樣看似矛盾的趨勢說明鉅視層級或單一面向的因素可能無法全面解釋青年貧窮的現象。至於影響貧窮問題的微觀因素,除了個人的收入不足,也與家中多少人賺錢、多少人需要經濟支持密切相關。因此,家戶組成這個微觀的因素也可能形塑青年貧窮的國際差異,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四) 家戶組成與青年貧窮

傳統以來,家庭是維繫個人經濟安全的保護網,因為家人之間會提供金錢、照顧、住所等支持,家戶資源被視為個人經濟福祉的重要指標。家戶特質組成勾勒一個家戶的經濟資源,例如家中成員的就業狀態、教育程度,因為高教育程度往往連結到比較高的工作職位與薪資,如果一個家庭中賺取薪資的人數越多、家中成員的教育程度越高,通常家庭收入也越高(Mendola et al. 2009)。經濟戶長的婚姻狀態、年齡、工作狀態也至為關鍵,單親家庭的家戶收入通常低於雙親家庭,因為單親意味著家中可能只有一份收入養家,甚至可能因為單身母親必須照顧子女,因而家中沒有賺取收入的成員(McLanahan and Casper 1995; Gornick

et al. 2009; Brady and Burroway 2012)。除此之外，家中如有較多經濟依賴者，如孩童、就學青年、其他無收入家庭成員，都可能使家戶的平均收入下降 (Tai and Treas 2009)。隨著年金制度的建立與擴張，許多人在離開職場後仍有穩定退休收入，高齡人口再就業也可維持生活所需，所以高齡成員可能增加家戶經濟資源。由於大部分 18-24 歲的青年仍然在校讀書、或剛剛進入職場，往往沒有太多經濟收入，青年若與有工作、有收入的父母或其他家戶成員同住，因而得到金錢、居住或其他的支援，比較不會面臨貧窮風險 (Iacovou 2009; Ayllón 2015)。

家庭結構與家戶組成皆基於不同文化規範而呈現不同的趨勢。文獻指出，家庭文化大致分為兩大類型：北歐、西歐、北美社會強調個人主義，個人通常甚早離家獨立，多代同居的情形不太普遍；東歐、南歐等地區則注重集體文化，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情況普遍 (Laslett 1988; Reher 1998)。根據 Billari 與 Liefbroer (2010) 對歐洲青年離家時程的觀察，以 1970 年代出生的女性為例，北歐女性的離家年齡中位數約為 19 歲，南歐女性最晚離家，離家年齡中位數是 24 歲，東歐女性約 22 歲離家。

比起西方社會，受到儒家文化影響，東亞社會更崇尚家庭群體生活。儒教傳統視家庭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推崇男尊女卑、長幼有序的家庭權力位階，強調個人於家庭的角色責任、凸顯友恭孝道精神，成員共居扶持的家庭、關係和諧的人際網絡被視為是增進個人福祉、裨益社會運作的最重要基礎 (Jones 1990; Walker and Wong 2005)。社會規範期待成年子女奉養照顧老年父母，離家並非成長的必經道路，而是一項選擇 (林谷蘭 2003；張詠菡 2018)，換句話說，東亞青年經常是在個人經濟條件足夠支持其獨立自居、或因結婚等情形下而離家。雖然東亞社會歷經工業化、都市化等變遷，儒教影響大幅減低，多代同住、家人緊密連結的情形依然普遍。例如，在 2006 年，40% 以上的韓國長者

居於多代家戶 (Kim et al. 2017)，在 2017 年，超過六成的臺灣高齡受訪者與成年子女同住 (行政院衛福部 2018)，與成年子女同住是許多長者希望的居住安排 (林如萍 2012)，而也有三成以上的成年子女認為與父母同住是奉養父母的重要方式 (伊慶春 2019)。尤其在經濟成長趨緩、婚育延後、房價高漲、青年失業率攀升等情形下，東亞年輕世代的離家時程日趨延後 (Fukuda 2009；張詠涵 2018)，與父母同住成為青年維持經濟安全的方法，臺灣父母則對年輕子女提供許多經濟與勞務支持 (林如萍 2012)。以臺灣為例，在 1996-2011 年間，18-24 歲青年居住於父母家的比例約為 69%-67% 左右，而 25-30 歲青年與父母同住比例則從 53% 提高到 66% (張詠涵 2018)。雖然日本青年通常比臺灣、南韓青年較早離家，當 1964-69 出生世代達到 20-24 歲時，仍有高達 55% 左右未曾離家 (Suzuki 2001)。

總的來說，由於青年仍然在學或初次就業，經濟收入並不穩定，與父母或其他有收入的成員同住，有助於他們的經濟福祉維持。離家是西方青年陷入貧窮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但貧窮持續時間卻各國不一。根據 Iacovou (2009) 的研究，以 20-24 歲芬蘭青年為例，在離家之初，約有 30% 的比例陷入貧窮，但在離家兩年之後，只有 5% 仍在貧窮中；義大利青年較晚離家，剛離家時，也有高達 24% 的青年陷入貧窮，兩年之後仍有 10% 在貧窮線以下，換言之，離家獨立雖然常讓西方青年進入貧窮狀態，但貧窮延續的時間長短不一，北歐青年的貧窮處境通常持續不久，而南歐青年雖然較晚離家，但是貧窮狀態延伸較長時間，也有較強烈的烙印作用。基於前述的發現，在探討跨國的青年貧窮現象時，勢必要將屬於微觀的家戶組成相關因素納入分析。

(五) 經濟機會結構

除了社會福利支出與家戶組成，一個國家的經濟環境與就業市場也強烈影響青年經濟福祉。重要的經濟發展與就業市場指標，包括失業率、經濟成長率、GDP 等，都能呈現經濟與就業環境。失業、工時不足、低薪等現象是造成青年與成人間收入差距的重要經濟因素。有些學者認為，由於工作經驗不足、職業技能欠缺，比起一般成年工作人口，青年的失業率較高、薪資較低、更常從事部分工時或臨時等非典型工作 (Quintini et al. 2007; Dietrich and Möller 2016)。若從事非典型工作，較不受工作法令保障，在經濟衰退時期尤其容易被解雇。例如，在 2007-2008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青年失業率大幅升高，整體 OECD 國家的平均青年失業率達到 12-14%，是中壯年失業率的兩倍 (OECD 2016)。

青年就業趨勢在各國情形不盡相同。以 2015 年為例，青年失業率在日本、南韓、奧地利、德國、瑞士、挪威等國較低，約為 5-11%，南歐青年（希臘、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則遭遇最高失業率，達到 32-50% 左右，而部分東歐（波蘭、斯洛伐克）與北歐國家的青年失業率也不低，達到 20% 以上 (OECD 2016)。由於經濟成長趨緩、就業環境惡化，臺灣的青年失業率近年來逐漸上升，從 2000 到 2012 年間，15-24 歲的失業率從 7.36% 增加為 12.63%，高於鄰近的日本、南韓 (劉佑學 2014；李健鴻 2015)。雖然東亞的青年失業率仍然低於大部分西方國家，但在 2015 年，臺灣與南韓青年失業與青壯年失業率（青壯年指 25-54 歲）的比率卻高達三倍，超過 OECD 國家的兩倍 (OECD 2016; ILO 2019)，所以，相對於西方國家，東亞青年的就業安全問題比起其他年齡層更為困難。

個人失業讓青年經濟福祉飽受威脅，在供需關係不平衡的情

形下，整體社會的高青年失業率也可能進一步壓低就業薪資。在此同時，經濟發展、收入分布趨勢等總體經濟表現也強烈影響個人的貧窮機率，但是關於這些經濟指數與貧窮的關係，實證結果並不一致（Mocan 1999; Ravallion 2001; Fosu 2011）。有學者指出，經濟成長與收入差距的連結可能是正向或負向相關，且互為因果（Shin 2012; Rubin and Segal 2015）。此外，在經濟成長初期或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可能比較明顯的降低貧窮率（Adams 2004; Fosu 2011; Thorbecke 2013）；另一方面，經濟成長也可能擴大收入差距，尤其，收入分配與相對貧窮率的計算高度相關（Foster and Shorrocks 1988），經濟收入的差距擴大，可能增加相對貧窮率。由於青年的平均薪資較低，在收入差距大的社會，青年陷入貧窮的風險也相對高。簡言之，微觀經濟因素（例如個人工作狀態、家戶收入等）對青年貧窮產生關鍵影響，在此同時，整體經濟發展與就業市場也對青年經濟福祉帶來重要作用。

（六）社會福利國家型態

雖然前面的文獻探討指出社會福利支出的年齡傾向、家戶組成、市場及收入結構對青年貧窮的獨立影響，然而，這些因素彼此緊密連結。社會福利制度的制定往往是回應經濟問題與家庭結構變動，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能挹注更多社會支出，而就業市場惡化與社會福利不足又常常凸顯家庭支持的重要性。

在經濟安全與福利政策趨勢國際比較的文獻中，福利國家型態分類是一項綜合方法，可以顧及前述諸多因素的連結關係。該方法雖然著重社會福利政策脈絡與內容，也同時考量經濟發展面向、以及家庭人口趨勢。例如，Esping-Andersen（1990, 1999）依據各項福利、經濟發展指標（例如去商品化、去家庭化、GDP），將國家區分為不同型態，其分類對後來研究的影響

頗大。Walther (2006) 參考各社會文化對青年角色的期待、Esping-Andersen (1990, 1999) 的福利國家分類、以及 Gallie and Paugam (2000) 的失業型態國家分類，提出青年轉銜型態國家分類。基於上述討論，將國家分為不同福利型態，可以使用綜合性因素，比較青年貧窮差異。因此，本文以 Esping-Andersen (1990, 1999)、Walther (2006) 的國家分類為基礎，並參考其他學者 (Castles and Mitchell 1991; Ferrera 1996; Bonoli 1997; Kwon 1997; White and Goodman 1998; Deacon 2000; Tang 2000; Holiday and Wilding 2003; Walker and Wong 2005; Fenger 2007)，將國家分為六大福利型態，比較青年貧窮趨勢。

第一類國家型態為北歐社會民主國家，Walther 則將其稱為普及式 (universalistic) 國家。顧名思義，其福利制度具普遍性，是以公民身分來定義個人權利義務，提供廣泛福利服務與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對各項福利政策投注的支出幾乎都高於其他國家 (如失業補助、年金給付、有薪育嬰假、公共托育等) (Lewis 1992; OECD 2019b)。此類國家的就業市場規定彈性高，就業政策著重人力資源累積 (Daguerre 2007; 古允文等 2016)，強調教育與技術訓練，提供適合個人能力的就業訓練與工作機會 (Barbier and Ludwig-Mayerhofer 2004)，同時保障受訓期間的個人生活所需保障等。不過，在財務壓力下，相關預算逐年遞減 (Lorentzen et al. 2014; Lundahl and Olofsson 2014)。在北歐文化裡，個人甚早離家，青年時期被視為個人生涯準備期，基於多面向的政策，當地青年從學校到職場的轉銜階段可以有比較多的選項 (Walther 2006)。

盎格魯薩克遜或英語系國家一般被稱為自由主義國家型態，這類國家強調使用市場機制來解決個人經濟問題，對各項社會福利 (例如年金、家庭政策、積極性就業政策等) 給予較少預算 (Esping-Andersen 1999; Gauthier 2002; Ameda et al. 2014)。

這些國家的就業市場雖然較有彈性（例如：提供較多部分工時、暫時性工作等），但青年失業率很高。在這些社會裡，青年時期意味著獨立的開始，經濟弱勢與失業常被歸因為個人因素（Walther 2006）。這些國家的積極性就業政策的主軸是工作優先（Daguerre 2007；古允文等 2016），提供工作給付與嚴格規範來促進個人工作意願與就業，政策著重私部門的雇用補助，有些政府提供短期職業訓練，但訓練內容品質不一，不一定能符合職場所需（Barbier and Ludwig-Mayerhofer 2004; Walther 2006; Card et al. 2010; Piopiunik and Ryan 2012）。

Walther（2006）與 Gallie 及 Paugam（2000）將保守組合主義模式國家歸類為就業為主軸的國家（employment-centered），大致包含歐陸國家（例如德國、法國、荷蘭等）。這類國家每年付出很高的福利預算（Lewis 1992; Sainsbury 1994; Ferragina et al. 2013; Martin 2014; OECD 2019b）。福利政策通常以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為主，而社會保險往往與職業身分相連接，核心工作得到比較完善的福利保障，邊陲性或非典型工作則不一定有社會保險保障（Esping-Andersen 1999）。對這類國家來說，青年階段是適應社會位置的時期（Walther 2006），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德國、瑞士、奧地利的青年就業過程最為平順、也最標準化，低青年失業率可部分歸因於二元職業訓練制度，這些政府的積極性就業政策著重職前技術訓練，訓練的期間較長（Card et al. 2010）。

由於獨特的福利制度、就業環境、和家庭文化，不少學者認為南歐國家是另一類福利型態（Ferrera 1996; Bonoli 1997），Walther（2006）及 Gallie 與 Paugam（2000）則視此類國家為社會保障不完備的國家（sub-protective）。最主要的福利制度包括雙元制度（dualistic system）、公私系統混和等。雙元制度運作與上述保守主義國家相近，以就業保險制度區分核心與邊陲工作

保障。但是不同於保守主義國家，南歐有高比例的非正式經濟生產 (informal economy)，青年較常從事這類工作，因此青年的福利保障不及一般成人。由於經濟發展滯、產學不符的教育、就業市場較無彈性、以及欠缺有效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等政策，比起其他西方國家，南歐青年最晚離家、轉銜期最漫長、青年長期失業率最高 (Piopiunik and Ryan 2012; Pastore 2017; OECD 2019a)。

許多學者將東歐國家歸類為一種福利國家型態，因為這些國家歷經共產制度，具有一些相似的國家福利政策，包含充分就業 (full employment)、全面的國家給付與社會服務 (Deacon 2000; Fenger 2007)。共產制度瓦解之後，所有國家都進行社會福利改革，大致的改革方向是將福利政策更加市場化，如依據工作年資與薪資多寡來計算年金替代率，大幅降低各種現金支付與社會服務 (Boeri and Edwards 1998; Forssén and Hakovirta 2002; OECD 2019b)。關於就業保障，這些國家投注在積極性就業政策與失業給付的預算低於 OECD 國家平均值 (Venn 2012; Martin 2014; OECD 2018)。就家庭政策來看，許多後共產國家走向更家庭化，大幅削減公共托育服務 (Robila 2012; Saxonberg 2012)。隨著政治經濟變革，東歐社會的失業率快速攀升、非典工作逐年增加、收入差距日益擴大，欠缺教育技術的年輕人常常面臨失業困境、或轉向非典型工作，缺乏社會福利保障 (Roberts 2003; Lutz et al. 2006)。

基於歷史文化、地緣相近、經濟與社會政策發展脈絡，許多學者將東亞國家列為另一福利國家型態 (Jones 1990, 1993; Kwon 1997; White and Goodman 1998; Tang 2000; Holiday and Wilding 2003; Walker and Wong 2005; Lee and Ku 2007; 李易駿、古允文 2003; 葉崇揚、古允文 2017)。臺灣等東亞國家常被稱為發展型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s)、生產性福利國

家 (productivist welfare states)、或儒家式福利國家 (Confucian welfare states)，Jones (1990, 1993) 則將東亞國家稱作家戶經濟式的福利國家 (Oikonomic welfare states or household economy welfare states)。不少學者認為 (例如：Jones 1990, 1993; Walker and Wong 2005)，儒教傳統對東亞福利體制產生關鍵作用：首先，儒教傳統的權力位階理念，有助於威權國家體制合理化、穩固政治發展；其次，儒教傳統強調個人於家庭的角色與責任，凸顯家庭作為社會基礎單位的修齊治平理念，鮮少論述個人權益或公民權利的概念。儒教強調的自立自強精神，顯然與新自由主義、殘補式福利體制有部分的契合。在此傳統影響下，面對戰後經濟重建，東亞社會啟動國家力量來主導社會政策，其特色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壓抑社會福利發展，而個人福利責任則由自己與家庭承擔。在此脈絡下，東亞政府早期提出的社會政策，旨在加強人力資源累積 (如義務教育)、促進經濟發展，為鞏固政權而將社會福利資源灌注於特定群體 (如軍公教保險、公宅設立)，對於非典型工作者、或初次尋職的青年，往往沒有提供相對的就業保障。

若與其他福利型態相比，東亞福利型態的特質包括整體福利支出低、去商品化低，大部分福利措施不具社會民主國家的普及性；東亞社會福利制度雖以社會保險為主、福利傾向階層化，但階層差異小於保守國家；再者，東亞國家提供殘補式社會救濟政策、強調個人福祉由自己與家庭擔負的精神，雖然與自由主義國家相近，但低福利支出、低福利涵蓋率的趨勢是由國家主導，這與自由主義國家不同 (Lee and Ku 2007)。不過，東亞國家也不是高度同質的。日本與臺灣、南韓差異較大，日本被視為混和型，具有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東亞福利特質 (Esping-Andersen 1990, 1999；李易駿、古允文 2003)。

隨著政治民主化、女性就業大幅增加、少子化、經濟成長

趨緩等趨勢，東亞國家逐漸擴大社會福利涵蓋對象與項目 (Shi 2012；Peng 2014；陳盈方等 2013)。不過，與大部分西方國家比起來，東亞國家的福利支出仍較低，與青年政策高度相關的社會支出、給付金額、涵蓋率等少於大部分 OECD 國家 (Martin 2014；OECD 2018；呂建德等 2014；胡中宜 2016)，托育服務明顯不足 (Schoppa 2010；王舒芸 2014)。再者，日本與臺灣的福利支出明顯偏向高齡人口 (Lynch 2006；Vanhuysse 2013；呂建德等 2014)，臺灣的非高齡支出尤其有限。關於就業政策，日本、南韓比臺灣投注更多預算，其政策主軸是以創造就業機會為主，而臺灣強調人力資本累積，不是以就業服務為主，積極性就業政策顯得零散 (古允文等 2016：307)。簡言之，面對經濟成長趨緩、產學不相符、社會福利支持有限，東亞青年失業率逐年攀升 (李易駿、古允文 2007；曾敏傑、林佩瑤 2005；劉弘毅 2014)。

總結文獻討論，社會福利、家戶組成、經濟與就業環境這三大因素建構了個人的機會結構。在高度去商品化、去家庭化的福利國家，一旦家庭與經濟市場保護個人生活所需的機制都失靈了，社會福利的支持就成了維繫個人經濟安全的保障。但是文獻呈現的矛盾趨勢是，社會福利支出高、社會支出的年齡傾向較中立的國家，其青年貧窮率也高，因此，我們亟需系統性、完整性的研究來檢視影響青年貧窮的因素。

三、研究假設

承接上述討論，首先，離家是青年陷入貧窮的主因之一，青年若與父母、或其他有收入的家庭成員同住，生活所需較有保障；因此，與父母或其他成年成員同住比例越高的國家（如東

亞、南歐)，對青年經濟福祉比較有利。另一方面，西方福利國家都投注更高的社會福利支出、提供更多福利措施，而文獻揭示的高福利支出國家有高青年貧窮的趨勢，有可能是多種因素共同形塑的現象；因此，若同時考量家戶組成與福利型態因素，我們能更清楚呈現這兩項因素對青年貧窮的作用，也更瞭解這兩類因素如何造成東亞青年與西方青年的貧窮差異。因此，本文的第一項研究假設為：家戶組成的不同會強烈影響福利國家型態之間青年貧窮可能性的差異（假設一）。具體來說，在不控制家戶特質的情形下，東亞青年處在貧窮的可能性低於西方青年；一旦控制了家戶特質，東亞青年的經濟優勢可能消失。

其次，許多文獻討論國家資源的世代分配不公，社會福利支出為有限資源，若政府資源獨厚高齡群體，年輕人可能獲得較少的經濟與服務支援。因此，我們的第二假設為：一旦控制了家戶特質與經濟相關指數，整體社會福利支出與社會福利的年齡取向會影響青年貧窮（假設二）。具體來說，在排除了家戶特質與社會整體經濟情況後，整體福利支出越低、社會福利支出愈傾向高齡人口，青年處在貧窮線以下的可能性愈高。

四、資料與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調查資料，此橫斷面微觀層級調查資料橫跨 1967 至 2018 年數十年時期，涵蓋 50 餘國具代表性的家戶收支資料，並有研究團隊負責跨國相容的資料處理，是目前學術界最常使用的國際收支調查資料之一。

為了進行跨國分析，我們必須考量個人與國家層級資料的調查時間與變項建構之跨國相容性，在此同時，我們希冀包含主要東亞工業化國家，也需要足夠的國家數量來檢視國家層級變項。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使用 25 個工業國家，除了日本資料收集於 2008 年，其他國家的家戶收支資料均調查於 2010 年。根據前面文獻的討論，我們將 25 國分為下列六類福利型態國家：社會民主國家（丹麥、芬蘭、挪威）、保守組合主義國家（奧地利、法國、德國、盧森堡、荷蘭、瑞士）、自由主義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英國、美國）、南歐國家（希臘、義大利、西班牙）、後共產國家（捷克、愛沙尼亞、立陶宛、波蘭、斯洛伐尼亞）、以及東亞國家（日本、南韓、臺灣）。基於上述青年定義，此研究樣本限於 18-24 歲的受訪者。去除遺漏值（例如不知道、拒答、不適用等），25 國家的分析樣本包含 134,826 人。

（二）變項測量

1. 貧窮線設定

依循許多國際貧窮研究（例如：European Commission、LIS），本研究採用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計算方式，貧窮線（poverty line）設為每位家戶成員的平均可支配家戶淨收入中位數的 60%，可支配家戶淨收入是指稅後家戶總收入（扣除各種賦稅與社會保險保費），包含市場收入（market income，例如工作薪資、投資收入等）、社會移轉收入（social transfers，例如公保退休年金、生育補助等）、以及私人移轉收入（private transfers，例如家人之間的金錢支援）。貧窮線具體計算方式是將家戶可支配淨收入除以每戶人數的平方根，此計算考慮了同家戶成員共同分攤諸多消費而減少生活花費成本的情形。依變項是依

據個人平均家戶收入是否低於貧窮線來編碼為虛擬變項（低於貧窮線 =1；不少於貧窮線 =0），測量個人收入低於貧窮線的可能性 (likelihood)。

2. 個人與家庭層級的解釋變項

由於貧窮線的計算是基於家戶收入，因而家戶組成是最重要的微觀層級變項。戶長特質一般被視為影響經濟福祉的重要變項，本研究包含戶長婚姻狀態（分為單身女性戶長、單身男性戶長、已婚或同居戶長）、戶長年齡（視為連續變項）。除了戶長特質，整體家戶成員特質組成也至為關鍵，我們加入每戶高教育人數（ISCED 5 級或以上，亦即大專以上）、有薪工作人數、未成年成員數（年紀小於 18 歲）、高齡成員數（65 歲或以上）。此外，我們也包括青年與戶長的關係（分為本人為戶長或戶長配偶、戶長之子女、其他），其目的在於檢視與父母同住對青年經濟福祉的作用。

3. 國家層級解釋變項

本研究著重社會福利國家政策對青年貧窮的影響，測量福利政策的變項包括社會福利國家型態、社會福利支出年齡傾向、以及整體社會福利支出。考慮鉅觀變項與依變項之間因果關係的可能內生性問題，我們將國家層級的資料往前推一年，使用 2009 年的鉅觀資料（日本鉅觀資料來自 2007 年，因為日本微觀資料取自 2008 年）。關於福利國家型態分類，本文已經在資料來源段落中陳述。整體社會支出資料來自 OECD 資料庫（OECD 2019b）與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a）、呂建德等人（2014）的研究報告，測量方式是每個國家的整體社會福利支出占該國當年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百分比（social expenditure as a percentage of GDP），用來評估社會福利的整體規模。關於社會福利支出的

年齡傾向，由於學者提供不同的測量方式，本文採用兩種常用計算方式，作為敏感度檢測 (sensitivity test)。第一種年齡傾向指數為老年對非老年支出比 (Elderly to Nonelderly Spending Ratio, ENSR)，是根據 Lynch (2006) 所建立的方法。其概念是每位高齡者 (65 歲以上) 獲得的社會福利支出相對於每位非高齡支出的比率，計算公式的分子是老年社會支出 (退休金加上遺屬年金) 除以高齡人口數，分母是非老年社會支出 (家庭政策支出、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支出、失業給付支出的總和) 除以非高齡人口數，所以 ENSR 指數愈高，表示社會福利支出愈傾向高齡人口。第二種指數是老年／非老年支出分攤 (Elderly/ Non-elderly Spending Share, ENSS)，是依據 Tepe 與 Vanhuysse (2010) 的方法，該指數測量老年社會支出占六項社會福利總支出的百分比，計算公式的分子是老年社會支出 (老年支出加上遺屬支出)，分母是六項社會支出總和 (退休金、遺屬年金、身障補助、家庭政策支出、積極性就業市場政策支出、失業給付支出)，再乘上 100。在初步分析中，此兩項指數的相關係數為 0.85 ($p < 0.001$)，說明這兩項指數對社會支出年齡傾向的評估高度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OECD 資料庫不包含臺灣，而且臺灣社會福利支出的計算與 OECD 計算不完全一致 (呂建德等 2014)。雖有資料限制，我們非常重視臺灣社會支出的年齡傾向對青年貧窮的影響，有學者參考 OECD 方法，估算臺灣的各項社會支出 (呂建德等 2014；古允文等 2016)，我們依據主計處統計與上述學者研究報告所公布的數值來計算臺灣的 ENSR 指數 (請參見表 2)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9a)，由於資料限制，臺灣的 ENSR 指數是依據 2009 年的中央社會支出資料，雖然該資料不包含地方支出，但學者指出地方支出占比有限 (呂建德等 2014)。在 ENSS 指數方面，由於我們沒有相容性資料來估算臺灣的 ENSS 指數，因此在

測試 ENSS 指數作用的模型中，我們排除了臺灣的樣本。

社會福利國家類別的變項則依據文獻探討的劃分區分成社會民主、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南歐、後共產與東亞六個類別。此外，模型中也加入國家層級的經濟變項，包含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的自然對數 (logged GDP per capita)、經濟成長率、以及青年失業率 (ILO 2019; World Bank 2019;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9b)，用來測量各國經濟發展與青年就業環境。

(三) 統計分析策略

本文使用的資料為多層級資料 (multilevel data)，包含國家層級與個人層級變項。多層次分析 (multilevel analysis) 是現階段最常應用於多階層資料的統計分析方法之一。此統計分析可以處理多階層資料的一些問題，例如，總體階層 (macro-level，此處為國家) 單位之內的誤差值可能有叢集趨勢，此情形違反 OLS 迴歸的基本假設 (即自變數之未觀測誤差的變異數為一常數)，多層次分析可以處理誤差值異質性問題。其次，多層次迴歸分析也可以估算每個總體層級單位的不同截距與斜率，這些估算方式都符合多階層資料的特性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但是，多階層邏輯迴歸分析運用也有一些限制，包含需要足夠的總體層級單位數量，例如 Bryan 與 Jenkins (2016) 建議，若是非線性迴歸分析，其總體層級單位數量至少要 30 個以上。因為本研究只包含 24-25 國，並不符合此一條件。在考量依變項為二類別變項 (收入低於貧窮線 =1，不低於貧窮線 =0) 的情況下，我們選擇邏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並估計叢集標準誤 (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使其不受國家內觀察值不獨立情況的影響，避免因此產生推論上的偏誤。此外，此一標準誤也適於大樣本估算中的統計推論 (Rogers 1994; Cameron and Miller 2011)。

依據 LIS 建議，我們使用 LIS 研究團隊建構的正常化加權變項 (normalized weight factor) 來調整資料分析，此加權變項可以修正抽樣偏誤、反應各國母數的比例。最後，我們使用 Stata 15 統計軟體中的邏輯迴歸的 cluster 指令 (即 logistic, cluster (國家)) 來估算模型。

五、分析結果

(一) 描述性分析結果

表 1 呈現各國的青年貧窮率與家戶特質分布。以 18-24 歲的貧窮率來看，25 國的總平均貧窮率為 16.47%，最高貧窮率落在美國、英國、南歐、法國等國家，在 22-28% 左右，北歐國家的貧窮率也不低，大致為 18-19%，臺灣、澳洲、奧地利、瑞士等國的貧窮率最低，約為 8-10%，日本與南韓的貧窮率也相對低，約為 12-14%。整體而言，英語系自由國家 (澳洲除外)、南歐、北歐青年的貧窮率最高，東亞青年面臨較低的經濟困境。

表 1 中第 4 欄至 6 欄說明青年的居住安排，分類為青年為戶長 (或戶長配偶)、戶長之子女、或其他成員。因為本研究的青年限制在 18-24 歲，平均來說，高達 76% 的青年與父母同住，只有 15% 身為戶長或配偶。自由國家、北歐青年與父母同住的比例較低，而南歐、保守主義、東亞青年與父母同住的平均比例都在八成以上。第 7 至 9 欄陳列戶長的婚姻狀態與年齡，北歐戶長最為年輕，南歐戶長最為年長，臺灣與韓國戶長也較為年長。戶長年齡分布反映青年居住安排情形，若有越多青年與父母同住，戶長的平均年齡也越高。

表 1：25 國的青年家戶特質分布

國家	樣本數	貧窮率	戶長／ 戶長配偶	戶長之 子女	其他	單身女性 戶長家戶	單身男性 戶長家戶	戶長 年齡	高教育 人數	工作 人數	未成年 人數	高齡 人數
福利國家型態												
社會民主	62082	18.28	32.32	59.92	7.75	16.10	10.50	40.00	0.49	1.75	0.77	0.03
丹麥	15285	19.16	30.07	54.12	15.81	19.32	13.82	38.34	0.46	2.08	0.58	0.04
芬蘭	1992	18.08	39.41	58.99	1.60	11.33	6.79	39.04	0.52	1.53	0.96	0.01
挪威	44805	17.60	27.49	66.66	5.85	17.64	10.88	42.61	0.50	1.64	0.76	0.03
保守主義	12376	13.38	13.94	81.61	4.45	14.12	6.00	46.23	0.49	2.19	0.63	0.06
奧地利	1072	9.43	13.49	80.24	6.27	13.17	6.37	44.53	0.42	2.49	0.61	0.13
德國	1770	14.07	16.07	81.31	2.62	12.99	8.67	44.18	0.44	2.27	0.60	0.04
法國	3605	23.67	23.87	70.57	5.56	19.46	6.89	43.01	0.54	1.56	0.79	0.04
盧森堡	1214	10.70	6.47	89.99	3.54	9.86	1.69	49.81	0.44	1.90	0.72	0.08
荷蘭	1663	12.27	15.58	80.56	3.86	17.63	6.97	46.62	0.54	2.01	0.56	0.01
瑞士	3052	10.12	8.18	86.98	4.84	11.62	5.38	49.25	0.55	2.90	0.51	0.04
自由主義	31086	19.09	17.76	67.24	15.01	20.45	10.79	42.15	0.80	2.17	0.76	0.06
澳大利亞	3220	8.11	17.10	63.80	19.10	17.59	10.26	41.05	0.87	2.66	0.59	0.06
加拿大	5485	17.84	14.28	70.13	15.59	17.67	14.74	43.57	1.03	2.49	0.56	0.08
愛爾蘭	726	16.89	11.25	78.81	9.94	24.08	8.89	44.38	0.81	1.65	0.95	0.04
英國	3948	24.83	24.04	62.73	13.23	21.38	9.74	40.48	0.54	1.98	0.64	0.04

續上頁表 1

國家	樣本數	貧窮率	戶長/ 戶長配偶	戶長之 子女	其他	單身女性 戶長家戶	單身男性 戶長家戶	戶長 年齡	高教育 人數	工作 人數	未成年 人數	高齡 人數
美國	17707	27.79	22.11	60.72	17.17	21.51	10.30	41.27	0.77	2.09	1.07	0.09
南歐	5187	23.31	5.63	89.24	5.13	10.31	4.15	50.23	0.58	1.56	0.47	0.11
希臘	972	24.26	6.48	89.14	4.38	7.97	3.91	50.55	0.61	1.40	0.39	0.14
義大利	1563	23.31	4.61	91.57	3.82	11.43	4.18	50.06	0.34	1.63	0.54	0.07
西班牙	2652	22.36	5.79	87.01	7.20	11.52	4.36	50.08	0.78	1.65	0.47	0.13
後共產	17031	15.18	12.54	77.44	10.03	16.01	8.23	44.08	0.58	1.95	0.70	0.13
捷克	1697	10.41	6.95	89.23	3.82	14.62	3.58	45.61	0.39	2.07	0.59	0.07
愛沙尼亞	1693	18.86	19.42	68.66	11.92	21.56	9.65	42.39	0.53	1.78	0.67	0.13
立陶宛	1163	17.19	16.93	66.65	16.42	21.86	16.12	41.12	0.66	1.89	0.79	0.15
波蘭	11192	17.17	12.43	74.99	12.58	12.86	8.30	44.46	0.32	2.09	0.98	0.17
斯洛伐尼亞	1286	12.25	6.96	87.65	5.39	9.17	3.48	46.82	0.99	1.94	0.49	0.14
東亞	7064	11.77	8.76	80.46	10.78	14.68	9.46	46.44	0.80	2.40	0.49	0.32
日本	1048	13.52	20.10	56.61	23.29	19.43	18.08	41.99	0.75	2.89	0.49	0.58
南韓	1951	12.06	2.89	95.84	1.27	13.10	3.16	49.20	0.71	2.03	0.48	0.11
臺灣	4065	9.72	3.29	88.94	7.77	11.51	7.15	48.13	0.95	2.27	0.50	0.28
總計/總平均	134826	16.47	15.01	76.08	8.91	15.61	8.13	44.74	0.62	2.04	0.65	0.11

資料來源：2010 LIS data (但日本資料來自2008年)

第 10 至第 13 欄顯示家中高教育人數、工作人數、未成年人數與高齡成員數。加拿大、斯洛伐尼亞、臺灣有最多高教育成員，義大利、捷克、波蘭最少，北歐與保守主義國家也不多。平均每戶工作人數在 1.40（希臘）至 2.9（瑞士、日本）之間，以福利國家型態的平均值而言，東亞家戶的工作人數最多（2.40），自由國家與保守組合主義次之，南歐最低（1.56）。未成年成員人數落在希臘（0.39）與美國（1.07）之間，若以福利國家的平均值來看，東亞與南歐家戶小孩數最低。最後，家中年長人數在 0.01（芬蘭、瑞士）與 0.58（日本）間，很明顯的，北歐年長人數最低（0.03），東亞家戶年長人數最高（0.32），這趨勢說明東亞社會裡多代同堂的居住安排比較普遍。

綜合來說，東亞社會的家戶組成有助於青年經濟福祉的維持，東亞家戶有最多工作人數、相對多的高教育成員、比較少小孩、也有最多高齡成員。雖然傳統上高齡成員被視為經濟依賴者，但隨著年金制度建立，大部分職場退休成員領有退休年金，不一定需要依賴家人。另一方面，北歐青年與父母同住的比例最低，他們家戶中高教育與工作人數較低、小孩數相對高，顯示比較多北歐青年自組家庭，可能因此造成青年落入貧窮。大多數自由國家（如美國、英國）同樣面臨很高的青年貧窮風險，這些國家的青年也是很早離家獨立，家戶育有較多小孩，單身女性戶長也比較普遍，因而可能面臨更多經濟壓力。雖然南歐青年與父母同住的情形很普遍，但是家中就業人數最低，可能因而連結到青年的高貧窮率。

表 2 綜述各國社會福利與經濟指數。以整體社會福利支出來看，北歐社會民主、南歐、大部分保守主義國家都對社會福利挹注很高的預算。相對地，臺灣、南韓的支出最低，分別是 GDP 的 10.5% 和 8.4%。就福利支出的年齡傾向而言，所有國家的平均老年支出都高於非老年支出，但各國福利支出的年齡傾向程度

不同。平均而言，社會民主國家的年齡傾向比較中立，若依據 ENSR 指數，每位高齡者得到的福利支出是非高齡者的 9-10 倍。與社會民主國家相似，愛爾蘭、英國、澳洲、荷蘭、盧森堡也比較中立。東亞國家（尤其臺灣、日本）、南歐（尤其希臘、義大利）、後共產國家（波蘭、斯洛伐尼亞）、美國等國家則給予高齡人口更優渥福利。以臺灣為例，臺灣的 ENSR 指數高達 39.08，換言之，每個高齡者獲得的支出是非高齡者的 39 倍，高於其餘 24 國，說明臺灣大部分的福利資源流向高齡人口。日本與波蘭的 ENSR 指數也很高，都超過 30 倍。

表 2：25 國的國家層級變項分布

福利國家型態	社會福利 總支出	ENSR	ENSS	青年 失業率	經濟 成長率	人均國內 生產毛額
社會民主	25.87	9.15	47.95	14.17	-4.90	61779.21
丹麥	28.30	8.71	47.24	11.80	-4.91	58163.29
芬蘭	26.90	8.90	51.96	21.50	-8.07	47107.16
挪威	22.40	9.83	44.65	9.20	-1.73	80067.18
保守主義	23.63	10.43	56.84	12.87	-3.76	59582.02
奧地利	27.50	13.14	65.20	10.70	-3.76	47963.18
德國	26.60	9.04	61.58	11.20	-5.70	41732.71
法國	31.00	12.25	65.38	23.00	-2.87	41575.42
盧森堡	24.00	8.79	49.41	17.20	-4.36	104393.00
荷蘭	17.40	8.56	45.67	6.60	-3.67	51900.34
瑞士	15.30	10.81	53.78	8.50	-2.22	69927.47
自由主義	19.88	11.55	50.77	17.62	-2.57	44170.20
澳大利亞	16.90	8.25	43.69	11.50	1.94	42709.80
加拿大	18.00	10.56	56.41	15.40	-2.93	40773.45
愛爾蘭	23.70	5.81	34.93	24.50	-5.08	52104.03
英國	22.20	7.56	51.13	19.10	-4.25	38262.18
美國	18.60	25.59	67.71	17.60	-2.54	47001.56

續上頁表 2

福利國家型態	社會福利 總支出	ENSR	ENSS	青年 失業率	經濟 成長率	人均國內 生產毛額
南歐	25.50	19.77	69.77	29.57	-4.45	33007.28
希臘	24.00	28.77	78.03	25.70	-4.30	29710.97
義大利	27.10	22.04	76.88	25.30	-5.28	36976.85
西班牙	25.40	8.50	54.40	37.70	-3.76	32334.01
後共產	21.02	17.22	60.25	21.58	-7.75	16493.34
捷克	20.10	12.54	58.27	16.60	-4.80	19741.60
愛沙尼亞	19.50	9.75	54.86	27.40	-14.43	14726.32
立陶宛	21.80	9.74	48.62	29.60	-14.81	11837.39
波蘭	21.20	35.14	71.78	20.70	2.82	11527.59
斯洛伐尼亞	22.50	18.93	67.72	13.60	-7.55	24633.80
東亞	12.20	28.49	67.32	10.70	0.25	23500.05
日本	17.70	33.71	83.48	7.70	1.65	35275.23
南韓	8.40	12.69	51.16	9.90	0.71	18291.92
臺灣	10.50	39.08	--	14.50	-1.61	16933.00
總平均	21.48	15.15	57.66	17.46	-4.06	40626.78

註：日本資料來自2007年，其他國家的資料來自2009年

表 2 第 5 至 7 欄表列各國的經濟發展與失業指數。青年失業率範圍落在 6.6%（荷蘭）與 37.7%（西班牙）之間。以福利國家型態的平均值來說，東亞與保守主義國家青年的失業率最低，南歐與後共產國家青年的失業率最高。關於國家財富，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範圍在 11,527（波蘭）與 104,393 美金（盧森堡）之間，經濟成長率落在負 14.81%（立陶宛）到 2.82%（波蘭）之間，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絕大部分國家於 2009 年呈現經濟負成長。簡言之，社會民主與保守主義國家最富裕，東歐的 GDP 最低，東亞社會的經濟成長最穩定。

歸結國家層級的特質，東亞國家的平均 GDP 雖然低於大部分西方國家，但展現較穩定的經濟發展、最低的青年失業率。在社會福利層面，東亞國家在社會福利上挹注最少的預算，卻將大部分的金額放在有關高齡人口的福利上，由此可知東亞社會福利政策對其青年最不友善。南歐、後共產、與自由國家的就業環境則對其青年就業帶來嚴峻挑戰。

(二) 邏輯迴歸分析

接下來的統計分析估算微觀與鉅觀因素對青年貧窮的作用。表 3 陳列邏輯迴歸分析結果，模型 1 只包含社會福利國家型態，模型 2 加入福利型態與家戶特質這兩類解釋變項，透過比較這兩個模型的結果，可檢視家戶特質如何影響福利國家間的青年貧窮差異。模型 3 只包含社會福利總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與 ENSR 指數，模型 4 加入社會福利總支出、ENSR 指數、鉅觀經濟變項、家戶特質。模型 5 只包含社會福利總支出與 ENSS 指數，模型 6 加入社會福利總支出、ENSS 指數、鉅觀經濟變項、家戶特質。後面四個模型探究這些變項如何形塑青年貧窮，也檢視福利支出與年齡傾向對青年貧窮的作用，是否因控制家戶特質、經濟指數與青年失業而有所變化。¹

根據模型 1，相較於東亞青年，除了保守主義國家的青年外，其他西方青年都更可能處在貧窮狀態（odds ratio，以下使用 OR：1.370-2.282， $p < 0.05$ - $p < 0.001$ ）。有趣的是，一旦控制了家戶特質（參見模型 2），福利國家型態的作用有所翻轉。具體來說，當我們比較家戶特質相似的年輕人，相較於東亞的青年，生活在社會民主與後共產國家的青年比較不會陷入貧窮（OR：

1 關於非線性模型係數跨模型比較的議題，我們依據 Breen, Karlson, and Holm (2018) 該文的建議，以 KHB 的方式檢視係數的變化。其結果與本文中的詮釋並無不同。

表 3：邏輯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國家層級						
福利國家型態 (東亞 = 參照組)						
社會民主	1.683***	0.516**	--	--	--	--
保守主義	1.063	0.687	--	--	--	--
自由主義	1.735*	0.887	--	--	--	--
南歐	2.282***	1.209	--	--	--	--
後共產	1.370*	0.673*	--	--	--	--
社會福利總支出的GDP占比	--	--	1.044**	0.977	1.034*	0.939***
ENSR指數	--	--	1.007	1.022*	--	--
ENSS指數	--	--	--	--	1.006	1.030***
青年失業率	--	--	--	1.026**	--	1.035***
經濟成長率	--	--	--	1.002	--	1.000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自然對數)	--	--	--	1.401*	--	1.526***
個人層級變項						
戶長婚姻 / 伴侶狀態 (有配偶或伴侶 = 參照組)						

續上頁表 3

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單身女性戶長	--	1.611***	--	1.627***	--	1.636***
單身男性戶長	--	1.444*	--	1.442*	--	1.433*
戶長年齡	--	0.988*	--	0.987*	--	0.987*
與戶長關係 (戶長或戶長配偶=參照組)						
子女	--	0.635**	--	0.676*	--	0.686*
其他	--	1.194	--	1.248	--	1.283
高教育人數	--	0.658***	--	0.666***	--	0.669***
有薪工作人數	--	0.370***	--	0.367***	--	0.352***
高齡人數 (>=65歲)	--	0.799	--	0.795	--	0.712*
未成年人數 (<18歲)	--	1.237***	--	1.216***	--	1.230***
常數	0.133***	2.672**	0.068***	0.046	0.067***	0.010***
樣本數(單位：個人)				134826		130761
樣本數(單位：國家)				25		24
Log Likelihood	-86203.175	-67319.627	-86601.220	-67379.318	-82746.402	-63469.475

*p<.05, **p<.01, ***p<.001

註：表格中迴歸係數為勝算比

0.516-0.673， $p<0.01$ - $p<0.05$)，而其他福利國家型態沒有統計上顯著的作用。我們進一步更換參照組來呈現福利國家的差異(結果呈現在附錄 1)。當以社會民主國家作為參照組，分析結果顯示，未控制家戶特質時，相較於社會民主國家，東亞和保守國家青年比較不會生活在貧窮線以下(OR: 0.594-0.632， $p<0.001$ - $p<0.01$)，而南歐青年更可能落入貧窮(OR: 1.356， $p<0.001$)。然而，一旦控制家戶特質時，比起社會民主青年，東亞、自由、南歐、與後共產國家的青年都更可能面對貧窮處境(OR: 1.303-2.341， $p<0.05$ - $p<0.001$)。而原本具有較低貧窮勝算(odds)的保守國家青年，則與北歐青年之間沒有統計上顯著差異。模型 1 與模型 2 的結果支持我們的第一項研究假設：家戶組成強烈影響國家間的青年貧窮差異。這結果說明東亞家庭特質比較可以維持青年的經濟安全。若將東亞家戶特質移除，則東亞青年的經濟優勢便消失。此外，社會民主的家庭組成最不利於青年經濟福祉。這結果也顯示福利國家型態的淨作用：對家戶特質相近的青年而言，相較於社會民主國家的福利制度，東亞、自由、南歐、後共產的福利制度比較沒有保障青年經濟安全的效益。

表 3 的模型 2 同時檢視家戶特質如何影響青年貧窮，其分析結果與文獻相近。以戶長特質來說，相較於有配偶或伴侶同住的家戶，以單身女性或男性為戶長的青年比較可能生活在貧窮線以下(OR: 分別為 1.611、1.444， $p<0.001$ 以及 $p<0.05$)，而戶長年齡與處於貧窮的可能性呈現負相關(OR: 0.988， $p<0.05$)。此外，若青年與更多高教育、有薪工作成員同住，則越不可能面臨貧窮問題(OR: 分別為 0.658、0.370， $p<0.001$)，家中未成年人數與貧窮呈正相關(OR: 1.237， $p<0.001$)，而家戶高齡人數則沒有顯著作用。最後，與青年戶長或身為戶長配偶相比，青年若與父母戶長同住，也比較不會生活在貧窮線以下(OR: 0.635， $p<0.01$)。

雖然福利國家型態分類有助於我們瞭解國際差異，但我們仍需要進一步探究社會福利支出、福利支出的年齡取向對青年經濟福祉的影響，其結果呈現在模型 3 至模型 6 中。模型 3 只包含社會總支出的 GDP 百分占比與 ENSR 指數，其結果顯示，在沒有控制家戶特質組成、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經濟成長率與青年失業率的情形下，社會總支出與青年貧窮可能性呈現正相關（OR：1.044， $p < 0.01$ ），而 ENSR 指數沒有顯著作用，這結果與上述的青年貧窮矛盾現象一致；換言之，福利支出越高的國家，其青年處在貧窮的勝算越高。在模型 4 中，除了社會總支出與 ENSR 指數，我們加入經濟相關指數與家戶特質，若控制了家戶特質組成、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經濟成長率與青年失業率，福利總支出對青年貧窮沒有顯著作用，而社會支出的高齡傾向對青年貧窮呈現正向作用（OR：1.022， $p < 0.05$ ），亦即，社會福利支出越傾向高齡人口的國家，青年貧窮風險越高。模型 3 與模型 4 的發現部分支持我們的第二項研究假設，這結果說明，若同時控制了家戶特質與鉅觀經濟指數，社會福利支出年齡傾向的顯著淨作用得以呈現。

模型 4 也檢視經濟指數與青年失業率的作用，青年失業率與青年貧窮的勝算呈現正相關（OR：1.026， $p < 0.01$ ），這結果與文獻一致。經濟成長率則沒有統計上顯著影響，不過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取自然對數）與青年貧窮呈現正相關（OR：1.401， $p < 0.05$ ）。可能的解釋是，在比較富裕的國家，收入分配可能更不平等，而相對貧窮率的計算與收入分配息息相關（Foster and Shorrocks 1988），通常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的情況，相對貧窮率也越高。因為大部分青年處在收入分配的下端，這情形可能部分解釋收入高的國家，青年處在貧窮線以下的可能性也比較高的情況。此外，模型 4 中的家戶特質作用則與模型 2 的結果很接近。

模型 5、模型 6 與模型 3、模型 4 相似，主要的差異在於在

模型 5 與 6 中是以 ENSS 指數取代 ENSR 指數，且不包含臺灣。其分析結果也與模型 3、模型 4 大致接近，ENSS 指數顯示正向作用（OR：1.030， $p < 0.001$ ），說明 ENSR 與 ENSS 兩指數對青年貧窮的作用是相當一致。不過，在模型 6 中，整體福利支出與青年貧窮呈現負向相關（OR：0.939， $p < 0.001$ ），顯示社會支出越高，青年落入貧窮的勝算越低。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樣本數偏大，為了避免 Type I error 的問題，在顯著度的選擇上本應持較高的標準（如採用 $p < 0.01$ 或 $p < 0.001$ ）。然而，除了顯著度外，係數數值與變項的變異量也是評估作用的重要依據。以 ENSR 為例，表 3 模型 4 中呈現 ENSR 的勝算為 1.022，亦即，老年對非老年支出比指數每增加一單位，青年的貧窮勝算便增加 2.2%，而 ENSR 指數介於 5.81 與 39.08 之間。以較為實際的數字來看，若 ENSR 指數由 6 增加至 16 單位（即增加了 10 個單位），則青年貧窮的勝算會增加 24.3% ($e^{(1.022 \times 10)} = 1.243$, $(1.243 - 1) \times 100 = 24.3$)，由於這樣高幅度的貧窮勝算增加，雖然 ENSR 指數的 p -value 為 0.027，我們認為其作用仍極為重要。並且，根據補充分析顯示，ENSR 指數的叢集標準誤，約略大於一般標準誤的 6-7 倍，因此，本文仍以 0.05 的顯著度來解釋迴歸係數。

總結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若只考慮社會福利與青年貧窮率，資料的確顯示青年貧窮的矛盾現象（即高社會福利支出的國家，其青年貧窮率越高）。這樣的矛盾現象可能是因為高社會支出國家的青年通常甚早離家，造成這些青年面對很高的貧窮風險，而東亞社會的福利支出雖低，其家戶特質保障了大部分青年的經濟安全。因此，當同時控制社會福利、家戶組成、經濟結構這三類主要結構性因素時，這些因素形塑國際青年貧窮率差異的作用就能清楚呈現。分析所得出的淨作用顯示：社會福利支出越偏向高齡人口、整體福利支出越低，青年越有可能落在貧窮線以

下，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民主與保守主義的福利體系比較能保障青年的經濟福祉。

六、結論與討論

回溯我們對跨國青年貧窮矛盾趨勢所提出的疑問：哪些鉅觀與微觀因素形塑高社會福利支出國家卻有高青年貧窮率的現象？社會支出的年齡取向是否影響青年貧窮？又是哪些因素影響東亞青年與西方青年的貧窮差異？我們的實證分析提出了一些解釋。首先，家戶組成差異是造成高社會福利支出國家卻有高青年貧窮率的關鍵機制，我們的發現是：若不考慮家戶特質差異，整體社會福利支出與青年貧窮呈現正向相關，而社會支出的年齡傾向沒有顯著影響青年貧窮；一旦控制了家戶特質（即比較家戶組成相近的青年），整體社會支出越高、社會福利政策年齡越中立，越能減低青年陷入貧窮的可能性。雖然家戶組成強烈形塑高福利與高青年貧窮的趨勢，整體社會福利支出與其年齡傾向都高度影響青年的經濟福祉。這結果也說明了我們必須同時檢視微觀與鉅觀因素，才能清楚呈現家戶組成、經濟環境、與社會福利政策對青年貧窮的淨作用。

我們的分析結果也顯示社會福利型態與家戶組成如何形塑國際間的青年貧窮差異。若不考慮家戶特質的差異性，東亞青年的貧窮勝算低於住在北歐、自由主義、南歐、後共產國家的青年，而南歐青年處在貧窮線以下的機率最高；如果控制了家戶特質，比起北歐社會民主青年，東亞、自由主義、南歐與後共產國家青年的貧窮勝算都大幅上升，顯著地超越了北歐青年。更進一步來說，社會民主國家的青年通常甚早離家自立，家裡比較少工作人數與高教育成員、且比較多孩童，造成這些青年面對很高的貧窮

風險；而東亞社會的福利支出雖低，其家戶特質比北歐、自由主義、南歐、後共產家戶特質更能保障青年經濟福祉，因為有很高比例的東亞青年與父母同住，東亞家中賺錢的人比較多、經濟依賴人數比較少，所以大部分東亞青年可以免於經濟困境。

綜述社會福利國家型態對青年貧窮風險的作用，社會民主與保守主義的福利系統更能支持青年的經濟福祉，這些國家除了對各項社會福利政策編列很高的預算，社會支出也較為年齡中立。此外，社會民主國家提供適合個人且多元的就業促進措施、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也對無工作青年提供基礎生活保障。多數保守主義國家則建立二元教育與職業訓練體制，協助青年就業，再者，保守主義國家也提供較全面的就業促進服務、尋職津貼等，幫助青年維繫經濟安全。

所有國家中，南歐與自由主義國家青年面對最嚴峻的經濟劣勢。英國、美國青年陷入貧窮的機率最高，貧窮率達到 25-28%，加拿大的青年貧窮率也在 18% 左右。如上所述，自由國家主張由市場機制來解決個人經濟安全，主要福利制度是以社會救濟來支持最貧困的群體，尤其在美國，除了福利支出低且大幅支出導向高齡人口，與青年相關的就業促進、家庭政策、失業補助等政策所涵蓋的對象與補助內容都十分有限，因而青年面對高貧困風險。就南歐來看，雖然這些政府的福利預算也很高，但是支出嚴重偏向高齡人口，大部分福利資源灌注到退休年金、核心勞動人口，而與年輕父母高度相關的 0-2 歲公共托育服務缺如，造成女性就業困難。此外，南歐國家的就業促進涵蓋的對象有限、且效果並不顯著，即使青年很晚離家，仍面臨最高的貧窮風險。

至於後共產國家，愛沙尼亞、立陶宛、波蘭的青年貧窮率在 17-18% 左右，這些國家不及西歐、北美富裕，青年失業率偏高，各項社會支出低於 OECD 國家平均值。其中，波蘭與斯洛伐

尼亞的高比例社會支出流向高齡者，面對就業環境困難、福利制度市場化的環境，青年的貧窮率也節節上升。

誠如上述討論，東亞青年的低貧窮風險主要來自家庭的有利組合。事實上，如表 3 所呈現的分析結果，一旦移除獨特的家戶特質，東亞青年的經濟優勢就消失了，反而他們面對的貧窮風險高於北歐與後共產社會青年。而且，相較於生活在其他國家的青年，東亞青年一樣沒有明顯的經濟優勢。這結果呼應了學者提出的儒家式福利體制特色 (Jones 1990, 1993; Walker and Wong 2005)，亦即，東亞社會致力於經濟發展、壓縮社會福利措施、將個人經濟與其他生活福祉歸由家庭與市場經濟來承擔。換句話說，由於家庭的支持、市場經濟的相對穩定，東亞國家的青年貧窮率低於絕大部分的西方工業國家，這情形可能造成多種問題。首先，相對低的青年貧窮率可能讓東亞政府忽略青年面臨的經濟問題，也忽視社會支出有限、福利資源分配嚴重不平等對青年經濟福祉的負向影響。其次，當青年獲得的社會福利資源相對有限，臺灣、南韓、日本家庭承擔了大部分青年的經濟安全責任，這情形也加重了其他家戶成員的壓力，尤其對於父母來說，現在的青年轉銜階段日益延長與不穩定，意味著父母養育子女時程的延續、經濟壓力的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其他國家，臺灣對社會福利投注最低預算，社會支出最傾向高齡，而且大幅流向某部分的高齡支出 (例如軍公教年金) (呂建德等 2014)。雖然臺灣社會福利支出在 2018 年上升到 GDP 的 11%，但是從 2010 到 2018 年這幾年的社會福利支出來看，臺灣高齡與遺屬支出從 5,820 億元增加到 10,380 億元，而生育與失業給付分別從 134 億與 201 億提升到 246 億與 158 億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9a)，這些數字在在說明臺灣福利資源在各年齡層分配的不平等問題比其他國家嚴重。

有學者提出，臺灣年金制度所產生的世代不公平問題比職業差異更為嚴重（王儷玲等 2019）。臺灣政府在 2017 年推動年金改革，改革方向包含調升保險費率、拉長投保薪資期間採計、逐年延後請領年齡、降低公教所得替代率等。但是，現階段的做法只是延後各種年金保險基金的破產時間，仍無法解決青年世代面臨未來年金匱乏的問題。因此年金制度改革應該持續進行，如持續延後請領年齡、降低高所得的替代率、設計動態年金調整機制等（陳芬伶、張森林 2019），政府也需要更積極提出促進經濟成長策略，希望能達到臺灣預算平衡、減低青年世代負擔的目標。

亟須注意的是，青年經濟福祉議題有其更重要的社會意涵。青年個人發展連結整體社會發展的前景，當經濟成長下滑、失業率攀升、社會福利支出又偏向高齡人口，青年面臨低度就業與低薪狀態而必須依賴父母時，青年可能認為成家立業的路途遙遙，因而更加延後婚育（Cheng 2014；王舒芸 2014）。近幾年政府針對青年提出更多積極性與消極性就業政策，也挹注更多預算於家庭政策（例如提供有薪育嬰假、生育獎勵金、0-5 歲育兒與托育津貼等），但是仍有許多改善空間。例如，托育與幼兒照顧服務的不足（王舒芸 2014；教育部統計處 2020），無異增加女性就業障礙，令年輕世代更加延遲婚育。此外，關於積極性就業政策，雖然各級政府針對青年提出「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初次尋職服務」、「職業培訓」等服務，但是諸多資格限制、相當有限的金額補助（如尋職津貼）、缺乏多元且與難與職場銜接的培訓課程，都可能使青年面臨就業困境、更趨依賴家庭。若政府能給予青年更完整的支持，如提供更廣泛的托育幼兒服務（王舒芸 2014）、建構較全面的「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提供更多元且符合職場需求的培訓課程、補助足夠的尋職津貼、規劃更有效的工作媒合機制（李健鴻 2015），若能給予青年一個較友善的環境，青年才能懷抱希望、成家立業。

總結來說，本文有兩項重要貢獻。首先，本文從多層次的角度來探究青年貧窮趨勢，同時檢視家戶層級與國家層級的影響機制，釐清青年貧窮的矛盾現象，檢視社會福利支出年齡傾向對青年貧窮影響。我們的實證結果發現，福利支出若能更年齡中立，政府若能制定更全面、更有效的積極性就業政策、家庭政策、失業補助，青年貧窮風險會顯著下降，這些發現對社會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實證參考。其次，過去青年研究幾乎只專注西方國家，我們將臺灣、日本、南韓加入跨國研究，比較東亞與其他工業化國家青年的經濟福祉，不但補充西方跨國研究專注西方社會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哪些鉅觀與微觀機制保障青年經濟安全、以及哪些機制需要修正補強。例如，本文分析結果發現，與其他 24 國比起來，臺灣的福利支出最偏向高齡，這情形強烈限制青年經濟獨立機會、進而影響青年發展，臺灣政府需要審慎評估社會支出的分配，提出更符合世代正義的社會福利政策。

雖然本文在青年貧窮研究上有重要的發現，本文仍有下列研究限制。首先，社會政策對個人經濟福祉的影響過程非常複雜，本文根據文獻，將社會福利支出分為高齡支出與非高齡支出兩類，而沒有進一步區分社會政策對於不同年齡層（例如高齡、兒童、中年等）的傾向程度，未來研究可以思考更精確的劃分。其次，基於國家數量與國際資料相容性等考量，我們選擇 2010 年調查的家庭收支資料、以及 2009 年的國家層級資料，從 2009-2010 年到現在，距離目前已有一段時間，舉凡青年貧窮率、家戶組成、社會福利政策、經濟環境與就業市場都有變化，但是關於本文的核心實證結果，即家戶特質、國家機制與青年貧窮可能性之關係是穩定的，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樣的關係會因為家戶特質與國家指數數值變化而有所不同。再者，雖然社會福利國家型態分類有助於國際比較，但是，如本文描述統計所揭示，各國家

型態之內的差異性大，以國家類型平均值來分析與討論，容易忽略其異質性。此外，因為跨國資料中許多變項測量不一致問題，我們的分析沒有包含一些重要個人與家庭機制，例如族群、工作時數等，未來研究也須思考加入這些變項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經濟環境影響了青年失業、低度就業、低薪等現象，而這些就業問題可能增加青年貧窮風險。但是本文遵循既有文獻，貧窮風險計算是基於整體家戶收入，因此我們使用家戶成員組成的特質（例如家中工作人數、高教育人數等），而非青年個人的就業、教育等特質來預測他們的貧窮可能性。關於這樣的限制，為了進一步探究經濟環境、青年就業與貧窮的連結，我們進行更多的補充分析（分析結果沒有列入正文模型中，詳細表格可供讀者索取）。根據分析結果，經濟成長率與青年無就業狀態呈現負向相關，並且，比起就業青年，若青年處在失業或無工作狀態，更可能落入貧窮，這樣的結果進一步支持我們的論述。

雖然本文有上述限制，本研究提供重要實證分析結果，藉由國際比較，我們能更瞭解青年貧窮趨勢、臺灣青年的經濟處境、以及影響青年貧窮機制，為臺灣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實證參考。

作者簡介

戴翠莪

主要研究領域為家庭社會學、貧窮研究、生命歷程、性別等。目前主要的學術著作聚焦於家庭、性別、貧窮等議題的跨國研究、以及臺灣的家庭變遷、家務分工趨勢。

陳易甫

主要研究領域為偏差與犯罪社會學、家庭社會學、生命歷程研究以及進階量化方法。研究包括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生成因素、家庭為基礎的介入性方案在偏差行為、藥物使用與健康行為上的效力、年輕人內外化問題之基因與環境影響與友誼網絡對青少年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的影響。

附錄1：邏輯迴歸分析結果（以社會民主國家為參照組）

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國家層級		
福利國家型態（社會民主=參照組）		
東亞	0.594***	1.936**
保守主義	0.632**	1.331
自由主義	1.031	1.718*
南歐	1.356***	2.341***
後共產	0.814	1.303*
個人層級變項		
戶長婚姻 / 伴侶狀態 （有配偶或伴侶=參照組）		
單身女性戶長	--	1.611***
單身男性戶長	--	1.444*
戶長年齡	--	0.988*
與戶長關係（戶長 / 戶長配偶=參照組）		
子女	--	0.635**
其他	--	1.194
高教育人數	--	0.658***
有薪工作人數	--	0.370***
高齡人數（>=65歲）	--	0.799
未成年人數（<18歲）	--	1.237***
常數	0.223***	1.380
樣本數（單位：個人）		134826
樣本數（單位：國家）		25
Log Likelihood	-86203.175	-67319.627

*p<.05, **p<.01, ***p<.001

註：表格中迴歸係數為勝算比

參考書目

- 王舒芸，2014，〈門裡門外誰照顧、平價普及路迢迢？台灣嬰兒照顧政策之體制內涵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6: 49-93。
(Wang, Shu-Yung, 2014, menli menwai shei zhaogu, pingjia puji lu tiaotiao? taiwan yinger zhaogu zhengce zhi tizhi neihan fenxi [The Analysis of Infant Care Policies and Debates in Taiwan].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96: 49-93.)
- 王儷玲、黃泓智、陳彥志、鄭惠恒，2019，〈臺灣年金制度改革的財務影響與世代不均問題〉。《臺大管理論叢》29(2): 139-172。DOI: 10.6226/NTUMR.201908_29(2).0005
(Wang, Jennifer L., Hong-Chih Huang, Yen-Chih Chen, Mark and Hui-Heng Cheng, 2019, Taiwan nianjin zhidu gaige de caiwu yingxiang yu shidai bujun wenti [Financial Effec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equity of Pension Reform in Taiwan]. taida guanli luncong [NTU Management Review] 29(2): 139-172.)
- 古允文、林宏陽、葉崇揚、陳嘉怡，2016，〈我國就業促進目標下之勞、社政福利服務整合規劃〉。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編號：NDC-DSD-104-011-004）。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
(Ku, Yeun-Wen, Hong-Yong Lim, Chung-Yang Yeh and Chia-Yi Chen, 2016, wo guo jiuye cujin mubiao xia zhi lao-, shezheng fuli fuwu zhenghe guihua. guojiafazhanweiyuanhui weituo yanjiu baogao (Project No.: NDC-DSD-104-011-004). Taipei: guojiafazhanweiyuanhui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 伊慶春，2019，〈臺灣的家庭變遷：家庭社會學者的研究關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4: 219-254。
(Yi, Chin-Chun, 2019, taiwan de jiating bianqian: jiating shehuixue zhe de yanjiu guanhuai [Changing Taiwanese Families: Research Concerns of Family Sociologists]. jindai zhongguo funüshi yanjiu 34: 219-254.)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a，107年社會保障支出統計。取用網址：

<https://reurl.cc/141lrD>，取用日期：2020年5月15日。

(Xingzhengyuan zhujizongchu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of Executive Yuan], 2019, 107 Nian She Hui Bao Zhang Zhi Chu Tong Ji [107 Statistics of Soci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33338&ctNode=3099&mp=1>. Retrieval date: May 15th 2020.)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b，國民所得統計摘要（108年5月更新）。取用網址：<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33338&ctNode=3099&mp=1>，取用日期：2019年8月16日。

(Xingzhengyuan zhujizongchu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of Executive Yuan], 2019, guomin suode tongji zhaiyao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National Income] (Updated: May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33338&ctNode=3099&mp=1>. Retrieval date: August 16th 2019.)

行政院衛福部，2018，《中華民國106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臺北市：行政院衛福部 <https://dep.mohw.gov.tw/DOS/lp-1767-113.html>，取用日期：2018年11月24日。

(Xingzhengyuan weifubu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8, zhonghuaminguo 106 nian laoren zhuangkuang diaocha baogao [Report of the Senior Citizen Condition Survey 2017]. Taipei: Xingzhengyuan weifubu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Retrieved from: <https://dep.mohw.gov.tw/dos/lp-1767-113.html>. Retrieval date: November 24th 2018.)

呂建德、李淑容、王舒芸、陳昭榮、林怡君，2014，《我國社會福利服務提供方式之研究》。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編號：NDC-DSD-102-015）。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

(Lue, Jen-Der, Shu-Jung Li, Shu-Yung Wang, Jun-Rong Chen and Yi-Chun Li, 2014, wo guo shehui fuli fuwu tigong fangshi zhi yanjiu. guojiafazhanweiyuanhui weituo yanjiu baogao (Project No.: NDC-DSD-102-015). Taipei: guojiafazhanweiyuanhui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李易駿、古允文，2003，〈另一個福利世界？東亞發展型福利體制初探〉。《臺灣社會學刊》31: 189-241。DOI: 10.6786/TJS.200312.

0189

(Lee, Yih-Jiunn and Yeun-Wen Ku, 2003, ling yi ge fuli shijie? dongya fazhanxing fuli tizhi chu tan [Another Welfare World?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Regime in East Asia]. taiwan shehuixue k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1: 189-241.)

李易駿、古允文，2007，〈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台灣青年從學校到職場轉銜過程中的 Yo-Yo 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7: 105-152。DOI: 10.29816/TARQSS.200709.0003.

(Lee, Yih-Jiunn and Yeun-Wen Ku, 2007, jihui kaifang huo jiegou Xianzhi? taiwan qingnian cong xuexiao dao zhichang zhuanxian guocheng zhong de Yo-Yo xianxiang [Opportunity Opening o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Yo-Yo Trajectory for the Taiwanese Young Adult's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67: 105-152.)

李健鴻，2015，〈臺灣青年的長期失業趨勢、原因與對策〉。《就業安全》14(1): 23-29。

(Lee, Chein-Hung, 2015, taiwan chingnian de changchi shihyeh chyushih, yuanyin yu dueitse. jiouyeh anchyuan [Employment Security]. 14(1): 23-29.)

林如萍，2012，〈臺灣家庭的代間關係與代間互動類型之變遷趨勢〉。頁 75-124，收錄於伊慶春、章英華編，〈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家庭與婚姻〉。臺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Lin, Ju-Ping, 2012, taiwan jiating de daijianguanxi yu daijianhudong leixing zhi bianqian qushi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a Typology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Parents: Trends in Taiwanese Families]. Pp. 75-124 in taiwan de shehui bianqian 1985-2005: jiating yu hunyin. Taipei: zhongyangyanjiuyuan shehuixue yanjiusuo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1985-2005: Family and Marriage].)

林谷蘭，2003，〈離巢？不離巢！〉。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Gu-Lan, Lin, 2003, li chao? bu li chao! [To Leave or Not to Leave].)

guoli zhengzhidaxue dizheng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Master thesis from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胡中宜，2016，〈再探台灣青年低度就業現象：政策與實務之檢視〉。論文發表於「2016年兩岸社會福利研討會」，臺北市，2016年11月5日。

(Hu, Chung-yi. zai tan taiwan qingnian didujiuye xianxiang: zhengce yu shiwu zhi jianzhi [Rethink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 toward Youth Underemployment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2016 nian liangan shehui fuli yantaohui. Taipei, November 5th 2016.)

張詠菡，2018，〈影響臺灣青年人口居住型態之價值觀因素〉。《住宅學報》27(2): 1-37。

(Chang, Yung-Han, 2018, yingxiang taiwan qingnian renkou juzhu xingtai zhi jiazhi guan yinsu [The Impact of Personal Values on Housing Status of Taiwanese Young Adults]. zhuzhai xuebao [Journal of Housing Studies] 27(2): 1-37.)

教育部統計處，2020，重要教育統計指標。取用網址：<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1B58E0B736635285&s=D04C74553DB60CAD>，取用日期：2020年4月28日。

(Jiaoyubu tongjichu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0, zhongyao jiaoyu tongji zhibiao [Highlights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1B58E0B736635285&s=D04C74553DB60CAD>. Retrieval date: April 28th 2020.)

陳芬苓、張森林，2019，〈勞保年金給付方式的新思維〉。《臺大管理論叢》29(2): 103-138。DOI: 10.6226/NTUMR.201908_29(2).0004

(Chen, Fen-Ling and San-Lin Chung, 2019, laobao nianjin jifu fangshi de xin siwei [The New Thought of Labor Insurance's Pension Benefits]. taida guanli luncong [NTU Management Review] 29(2): 103-138.)

陳盈方、呂建德、葉秀珍，2013，〈朝向積極勞動市場政策（1996-2011）：台灣政黨的差異與趨同〉。《台灣社會學》26: 37-96。DOI: 10.6676/TS.2013.26.37

- (Chen, Ying-Fang, Jen-Der Lue and Hsiu-Jen Yeh, 2013, *chau xiang jiji laodong shichang zhengce (1996-2011): taiwan zhengdang de chayi yu qutong [Toward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1996-2011): The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of Partisan Preferences in Taiwan]. taiwan shehuixue [Taiwan Sociology] 26: 37-96.*)
- 曾敏傑、林佩瑤，2005，〈我國青少年勞工的失業風險與變遷〉。《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3: 1-42。DOI: 10.29734/SJSW.200512.0001
- (Tseng, Min-Chieh and Pei-Yao Lin, 2005, *woguo qingshaonian laogong de shiye fengxian yu bianqian [The Transition of Youth Unemployment in Taiwan]. dongwu shehuigongzuo xuebao [Soochow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3: 1-42.*)
- 黃志隆，2013，〈歐洲社會投資理念的發展與分歧〉。《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1(1): 157-172。DOI: 10.6265/TJSW.2013.11(1)5
- (Huang, Chih-Lung, 2013, *ouzhou shehui touzi linian de fazhan yu fenqi [The Development and Varieties of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in Europe]. taiwan shehui fuli xue k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1(1): 157-172.*)
- 葉崇揚、古允文，2017，〈從生產性福利體制到社會投資福利國家：臺灣與韓國的比較〉。《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1(1): 97-147。DOI: 10.6785/SPSW.201706_21(1).0003
- (Yeh, Chung-Yang and Yeun-Wen Ku, 2017, *cong sheng chan xing fuli tizhi dao shehui touzi fuli guojia: taiwan yu hanguo de bijiao [From Productivist Welfare States to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Comparing Taiwan and Korea]. shehui zhengce yu shehui gongzuo xue kan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21(1): 97-147.*)
- 劉弘毅，2014，〈尼特族之服務策略探究〉。《社區發展季刊》146: 149-161。
- (Liu, Hung-Yi, 2014, *nitezu zhi fuwu celue tan jiu [The Exploration of Service Strategies for Young People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shequ fazhan ji k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146: 149-161.*)
- 劉侑學，2014，〈臺灣青年失業：趨勢與成因的考察〉，《社區發展季刊》146: 77-93。

- (Liu, Yu-Hsueh, 2014, taiwan qingnian shiye: qushi yu chengyin de kao cha [Youth Unemployment in Taiwan: Trends and Causes]. shequ fazhan ji k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146: 77-93.)
- Aassve, Arnstein, Elena Cottini and Agnese Vitali, 2013, "Young Prospects in a Time of Economic Recession." *Demographic Research* 29(36): 949-962. DOI: 10.4054/DemRes.2013.29.36
- Adams, Richard H., 2004, "Economic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stimating the Growth Elasticity of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32(12): 1989-2014. DOI: 10.1016/j.worlddev.2004.08.006
- Ameda, Willem, Nabil Ali and Olivier Thévenon, 2014, "Changes in Family Policies and Outcomes: Is there Convergence?"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 157. Paris, France: OECD Publishing.
- Arnett, Jeffrey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 469-480. DOI: 10.1037/0003-066X.55.5.469
- Arnett, Jeffrey J., Rita Žukauskienė and Kazumi Sugimura, 2014, "The New Life Stage of Emerging Adulthood at Ages 18-29 Years: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Lancet Psychiatry* 1(7): 569-576. DOI: 10.1016/S2215-0366(14)00080-7
- Ayllón, Sara, 2015, "Youth Poverty, Employment, and Leaving the Parental Home in Europ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61(4): 651-676.
- Barbier, Jean-Claude and Wolfgang Ludwig-Mayerhofer, 2004, "Introduction: The Many Worlds of Activation." *European Societies* 6(4): 423-436. DOI: 10.1080/1461669042000275845
- Billari, Francesco C. and Aart C. Liefbroer, 2010, "Towards A New Pattern of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15(2-3): 59-75. DOI: 10.1016/j.alcr.2010.10.003
- Boeri, Tito and Scott Edwards, 1998, "Long-Term Unemployment and Short-Term Unemployment Benefit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Non-Employment Subsid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mpirical Economics* 23(1-2): 31-54. DOI: 10.1017/

S004727949700505910.1007/BF01205679

- Bonoli, Giuliano, 1997, "Classifying Welfare States: A Two-Dimension Approach."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6: 351-372. DOI: 10.1017/S0047279497005059
- Bradbury, Bruce and Markus Jäntti, 2001, "Child Poverty across Twenty-five Countries." Pp. 62-91 in *The Dynamics of Child Pover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edited by Bruce Bradbury, Stephen P. Jenkins and John Micklew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11522147.003
- Brady, David and Rebekah Burroway, 2012, "Targeting, Universalism, and Single-Mother Poverty: A Multilevel Analysis Across 18 Affluent Democracies." *Demography* 49(2): 719-746. DOI: 10.1007/s13524-012-0094-z
- Bryan, Mark L. and Stephen P. Jenkins, 2016, "Multilevel Modeling of Country Effects: A Cautionary Tal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1): 3-22. DOI: 10.1093/esr/jcv059
- Cameron, A. Collin and Douglas L. Miller, 2011, "Robust Inference with Clustered Data." Pp. 1-28 in *Handbook of Empiric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edited by Aman Ullah and David E. Giles. Hoboken: CRC Press. DOI: 10.1201/b10440-2
- Caminada, Koen and Kees Goudswaard, 2009,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EU: A Descriptive Analysis." *Poverty and Public Policy* 1(2): 1-49. DOI: 10.2202/1944-2858.1023
- Caminada, Koen, Kees Goudswaard and Ferry Koster, 2011, "Social Income Transfers and Poverty: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for OEC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1(2): 115-126. DOI: 10.1111/j.1468-2397.2011.00815.x
- Card, David, Jochen Kluge and Andrea Weber, 2010,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Evaluations: A Meta-analysis." *The Economic Journal* 120(548): F452-F477. DOI: 10.1111/j.1468-0297.2010.02387.x
- Castles, Francis and Deborah Mitchell, 1991,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or Four?*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Graduate Program in Public Policy.

- Celikay, Ferdi and Erdal Gumus, 2017, "The Effect of Social Spending on Reducing Pover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44(5): 620-632. DOI: 10.1108/IJSE-10-2015-0274
- Chauvel, Louis and Martin Schröder, 2014, "Generational Inequalities and Welfare Regimes." *Social Forces* 92(4): 1259-1283. DOI: 10.1093/sf/sot156
- Cheng, Yen-Hsin Alice, 2014, "Changing Partner Choice and Marriage Propensities by Education in Post-industrial Taiwan, 2000-2010." *Demographic Research* 31(1): 1007-1042. DOI: 10.4054/DemRes.2014.31.33
- Choudhry, Misbach T., Enrico Marelli and Marcello Signorelli, 2012, Youth unemployment rate and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33(1): 76-95. DOI: 10.1108/01437721211212538
- Daguerre, Anne, 2007,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and Welfare Reform: Europe and the U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Palgrave.
- Deacon, Bob, 2000, "Easter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The Impact of 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0(2): 146-161. DOI: 10.1177/a012487
- Dietrich, Hans and Joachim Möller, 2016, "Youth Unemployment in Europe—Business Cycle and Institutional Effec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13(1): 5-25. DOI: 10.1007/s10368-015-0331-1
- Esping-Andersen, Gøsta ,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østa ,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rragina, Emanuele, Martin Seeleib-Kaiser and Mark Tomlinson, 2013, "Un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Family Policy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A Dynamic Approach to Welfare Regime Theory."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47(7): 783-805. DOI: 10.1111/j.1467-9515.2012.00855.x
- Ferrera, Maurizio, 1996, "The Southern Model of Welfare in Social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6(1): 17-37. DOI:

10.1177/095892879600600102

- Fenger, Menno, 2007, "Welfare Regim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corporating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in a Welfare Regime Typology."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Ideas in Social Sciences* (CISS) 3(2).
- Forssén, Katja and Mia Hakovirta, 2002, "Family Policy, Work Incentives, and the Employment of Mothers." Pp. 297-309 in *Social Security in the Global Village*, edited by Roland Sigg and Christina Behrendt.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DOI: 10.4324/9781315129785-15
- Foster, James E. and Anthony F. Shorrocks, 1988, "Inequality and Poverty Ordering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2-3): 654-661. DOI: 10.1016/0014-2921(88)90212-7
- Fosu, Augustin K., 2011,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cent Global Evidence." *WIDER Working Paper*, No. 2011/01. Helsinki :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 Fukuda, Setsuya, 2009, "Leaving the parental home in post-war Japan: Demographic changes, stem-family norms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Demographic Research* 20: 731-816.
- Gál, Róbert I., Pieter Vanhuyse and Lili Vargha, 2018, "Pro-Elderly Welfare States within Child-Oriented Societi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5(6): 944-958. DOI: 10.1080/13501763.2017.1401112
- Gallie, Duncan and Serge Paugam, 2000, "Chapter 1: The Experience of Unemployment in Europe: The Debate." Pp. 1-22 in *Welfare Regim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Unemployment in Europe*, edited by D. Gallie and S. Paug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uthier, Anne H., 1999, "Historical Trends in State Support for Families in Europe (post-1945)."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1(11-12): 937-965. DOI: 10.1016/S0190-7409(99)00062-6
- Gauthier, Anne H., 2002, "Family Polic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s There Convergence?" *Population* 57(3): 447-474. DOI: 10.3917/pope.203.0447

- Gornick, Janet C., Teresa Munzi, Eva Sierminska and Timothy M. Smeeding, 2009, "Income, Assets, and Poverty: Older Wome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men, Politics & Policy* 30(2-3): 272-300. DOI: 10.1080/15544770902901791
- Gornick, Janet C., 2007, "Chapter 8: Social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in OECD Countries, 1980-1995: Shifting Allocations, Changing Needs." Pp. 201-226 in *Allocating Public and Private Resources across Generations*, edited by Anne H. Gauthier, C. Y. Cyrus Chu and Shrlpad Tuljapurkar.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DOI: 10.1007/978-1-4020-4481-6_8
- Hicks, Alexander and Joya Misra, 1993,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the Growth of Welfare in Affluent Capitalist Democracies, 1960-1982."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3): 668-710. DOI: 10.1086/230320
- Holiday, Ian and Paul Wilding, 2003, "Conclusion." Pp. 161-182 in *Welfare Capitalism in East Asia: Social Policy in the Tiger Economies*, edited by Ian Holiday and Paul Wildi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uber, Evelyne, Charles Ragin and John D. Stephens, 1993, "Social Democracy, Christian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elfare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3): 711-49. DOI: 10.1086/230321
- Iacovou, Maria, 2009,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with Longitudinal Data: Research into Youth Poverty."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ety* 4(2): 149-160. DOI: 10.1080/17450140903000266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2019, 8.5.2 Unemployment rate. <https://ilostat.ilo.org/data/> (Date visited: June 15, 2019).
- Jones, Catherine, 1990, "Hong Kong,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Oikonomic Welfare States." *Government & Opposition* 25 (4): 447-62. DOI: 10.1111/j.1477-7053.1990.tb00396.x
- Jones, Catherine, 1993, "The Pacific Challenge: Confucian Welfare States." Pp. 184-202 in *New Perspectives on Welfare State in Europe*, edited by Catherine Jones. London, UK: Routledge.
- Kenworthy, Lane, 1999, "Do Social-Welfare Policies Reduce Poverty? A

- Cross-National Assessment.” *Social Forces* 77(3): 1119-1139. DOI: 10.1093/sf/77.3.1119
- Kim, Juyeong, Young Choi, Sohee Park, Kyoung-Hee Cho, Yeong-Jun Ju and Eun-Cheol Park, 2017, “The Impact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Quality of Life among Korean Elderly: Findings from the 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 (2006-2012).”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6(5): 1303-1314. DOI: 10.1007/s11136-016-1448-6
- Kvist, Jon, 2015, “A Framework for Social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tegrating Generational, Life Course and Gender Perspectives in the EU social Investment Strategy.”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3(1): 131-149. DOI: 10.1057/cep.2014.45
- Kwon, Huck-Ju, 1997, “Beyond European Welfare Regim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n Welfare System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6(4): 467-484. DOI: 10.1017/S004727949700514X
- Laslett, Peter, 1988, “Family, Kinship, and Collectivity As Systems of Suppor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A Consideration of the Nuclear Hardship Hypothe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3(2): 153-176. DOI: 10.1017/S026841600000093X
- Lee, Yih-Jiunn and Yeun-Wen Ku, 2007, “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s: Testing the Hypothesis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1(2): 197-212. DOI: 10.1111/j.1467-9515.2007.00547.x
- Lewis, Jane, 1992, “Gend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Regim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3): 159-173. DOI: 10.1177/095892879200200301
- Lorentzen, Thomas, Anna Angelin, Espen Dahl, Timo Kauppinen, Pasi Moisio and Tapio Salonen, 2014,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Security for Young Adults in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 from Unemployment Protection to Poverty Rel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3(1): 41-51. DOI: 10.1111/ijsw.12006
- Lundahl, Lisbeth and Jonas Olofsson, 2014, “Guarded Transitions? Youth Trajectories and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Policies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19(sup1): 19-34. DOI:

10.1080/02673843.2013.852593

-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 2019, *Inequality and Poverty Key Figures*. <https://www.lisdatacenter.org/lis-ikf-webapp/app/search-ikf-figures> (Date visited: July 17, 2019).
- Lynch, Julia, 2006, *Age in the Welfare State: the Origins of Social Spending on Pensioners, Workers, and Childr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John P., 2014, "Activation and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Stylized Facts and Evidence on their Effectiveness." *IZA Policy Paper*, No. 84. Bonn, German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 Mayer, Karl U. and Urs Schoepflin, 1989,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1): 187-209. DOI: 10.1146/annurev.so.15.080189.001155
- Marcum, Chris S. and Judith Treas, 2013.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Revisited: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293-313 in *Kinship and Cohort in an Aging Socie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edited by Merril Silverstein and Roseann Giarruss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cLanahan, Sara and Lynne Casper, 1995, "Growing Divers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Pp. 1-45 in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 in the 1990s, vol. 2: Social Trends*, edited by Reynolds Farle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Mendola, Daria, Annalisa Busetta and Arnstein Aassve, 2009, "What Keeps Young Adults in Permanent Pover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ECHP."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4): 840-857. DOI: 10.1016/j.ssresearch.2009.04.003
- Mocan, H. Nanci, 1999,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Cyclical Unemploy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1(1): 122-134. DOI: 10.1162/003465399767923872
- Morel, Nathalie, Bruno Palier and Joakim Palme (2012). "Social Investment: A Paradigm in Search of a New Economic Model and Political Mobilisation." Pp. 353-376 in *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 Welfare State? Ideas,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edited by Nathalie Morel, Bruno Palier and Joakim Palme. Bristol, UK: The Policy Press. DOI: 10.1332/policypress/9781847429247.003.0014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6,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6*.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8,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6*.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9a, Youth Unemployment. Available at: <https://data.oecd.org/unemp/youth-unemployment-rate.htm> (Date visited: May 23, 2019).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9b, *OECD 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 (SOCX)*. <http://www.oecd.org/statsportal/> (Date visited: July 14, 2019).
- O'Higgins, Michael, 1988,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to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in OECD countries." Pp. 201-228 in *The Vulnerable*, edited by John L. Palmer, Timothy Smeeding, and Barbara B. Torrey.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 Pampel, Fred C., 1994, "Population Aging, Class Context, and Age Inequality in Public Spen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 153-195. DOI: 10.1086/230502
- Piopiunik, Marc and Paul Ryan, 2012, "Improv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Education/Training and the Labour Market: What Can We Learn from Various National Approaches?" *EENEE Analytical Report*, No. 13. Brussels, Belgium: European Commission Publications.
- Pastore, Francesco, 2017, "Why So Slow? The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in Italy." *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10767. Bonn, Germany: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IZA).
- Peng, Ito, 2014, "The Social Protection Floor and the 'New' Social Investment Polici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Global Social Policy* 14(3): 389-405. DOI: 10.1177/1468018114533711
- Preston, Samuel H., 1984,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Divergent Paths for America's Dependents." *Demography* 21(4): 435-457. DOI: 10.2307/2060909

- Quintini, Glenda, John P. Martin and Sébastien Martin, 2007,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Process in OECD Countries." *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2582. Bonn, Germany: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IZA).
- Raudenbush, Stephen W. and Anthony S. Bryk, 200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Ravallion, Martin, 2001,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Looking beyond Averages." *World Development* 29(11): 1803-1815. DOI: 10.1016/S0305-750X(01)00072-9
- Reher, David S., 1998, "Family Ties in Western Europe: Persistent Contrast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4(2): 203-234. DOI: 10.2307/2807972
- Roberts, Ken, 2003,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Youth Transitions in Eastern Europe: Lessons for Western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1(4): 484-505. DOI: 10.1111/j.1467-954X.2003.00432.x
- Robila, Mihaela, 2012, "Family Policies in Eastern Europe: A Focus on Parental Leave."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1(1): 32-41. DOI: 10.1007/s10826-010-9421-4
- Rogers, William H., 1994, "Regression Standard Errors in Clustered Samples." *Stata Technical Bulletin* 13:19-23.
- Rowntree, B. Seebohm, 19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London, U.K.: Macmillan.
- Rubin, Amir and Dan Segal, 2015,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45: 258-273. DOI: 10.1016/j.jmacro.2015.05.007
- Sainsbury, Diane, ed., 1994, *Gendering Welfare Stat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Saxonberg, Steven, 2012, "From Defamilialization to Degenderization: Toward a New Welfare Typology."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7(1): 26-49. DOI: 10.1111/j.1467-9515.2012.00836.x
- Schoppa, Leonard, 2010, "Exit, Voice, and Family Policy in Japan: Limited Changes Despite Broad Recognition of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 Problem.”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5): 422-432. DOI: 10.1177/0958928710380477
- Shi, Shih-Jiunn, 2012, “Shifting Dynamics of the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from Income Maintenance to Labour Protection.”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5(1): 82-96. DOI: 10.1080/17516234.2012.662357
- Shin, Inyong, 2012,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Modelling* 29(5): 2049-2057. DOI: 10.1016/j.econmod.2012.02.011
- Suzuki, Toru, 2001, “Leaving the parental household in contemporary Japan.” *Review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Policy* 10: 23-35.
- Tai, Tsui-O, 2017, “Decomposing Youth Poverty in 22 Countries—Contributions of Household Composition, Social Welfare, and the Market to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in Youth Poverty.” *EurAmerica* 47(3): 299-343. DOI: 10.7015/JEAS.201709_47(3).0002
- Tai, Tsui-O and Judith Treas, 2009, “Does Household Composition Explain Welfare Regime Poverty Risks for Older Adults and Other Household Member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64B(6): 777-787. DOI: 10.1093/geronb/gbp039
- Tang, Kwong-Leung, 2000,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New York: Palgrave.
- Tepe, Markus and Pieter Vanhuyse, 2010, “Elderly Bias, New Social Risks and Social Spending: Change and Timing in Eight Programmes across Four Worlds of Welfare, 1980-2003.”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3): 217-234. DOI: 10.1177/0958928710364436
- Thorbecke, Erik, 2013, “The Interrelationship Linking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2 (AERC Supplement 1): i15-i48. DOI: 10.1093/jae/ejs028
- Vanhuyse, Pieter, 2013, “Measuring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Toward a Synthetic Index for OECD Countries.” Pp. 10-61 in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Aging Societies: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edited by Daniel Schraad-Tischler and Najim Azahaf. Gütersloh, Germany: Bertelsmann Stiftung.

- Venn, Danielle, 2012, "Eligibility Criteria for Unemployment Benefits: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for OECD and EU Countrie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 131.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 Walker, Alan and Chack-Kie Wong, 2005, "Conclusion: from Confucianism to Globalisation." Pp. 213-224 in *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s in Transition: from Confucianism to Globalisation*, edited by Alan Walker and Chack-Kie Wong. Bristol, UK: The Policy Press.
- Walther, Andreas, 2006, "Regimes of Youth Transitions: Choice, Flexibility and Security in Young People's Experiences across Different European Contexts." *Young: Nordic Journal of Youth Research* 14(2): 119-139. DOI: 10.1177/1103308806062737
- White, Gordon and Roger Goodman, 1998,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an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Pp. 3-24 in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Roger Goodman, Gordon White and Huck-Ju Kwon. London: Routledge.
- World Bank. 201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Date visited: July 17, 2019).